



READERS

读者®

■ 云中的双子座 ■ 大国空村 ■ 如果你有一名穷亲戚 ■ 他们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5·20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01期 十月下

河在峰头上流过

●贾平凹

秦岭历来是隐者的去处，现在仍有千人在其中修行。我去拜访了一位，他已经山洞里住了五年。对我的到来，他既不拒绝也不热情，无视着，犹如我是草丛里走过的小兽，或是风吹过来的一缕云彩。

他坐在洞口一动不动，眼看着远方，远方是错落无序的群峰。我说：“师父是看落日吗？”

他说：“不，我在看河。”

我说：“河在沟底呀，你在峰头上看？”

他说：“河就在峰头上流过。”

他的话让我大为吃惊，我回城后就画了一幅画。我每每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给自己鼓劲，就要在书房里挂上为新小说写的书画条幅。这次我画的是《过山河图》，水流不再在群山众沟间千回百转，

而是无数的山头上有了一条汹涌的河。

还是在秦岭，我曾经去看望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我一个熟人的亲戚，熟人给我多次介绍，这位老人是他们那条峪里

六七个村寨中最有威望的，几十年来无论哪个村寨有红白事，他都被请去做执事。即便如今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但谁家和邻居闹了矛盾，哪家兄弟们分家，还是用滑竿抬了他去主持。

我见到了老人，问他为何如此德高望重，他说：“我只是说些公道话而已。”

再问他怎样才能把话说得公道，他说：“没有私心、偏见，你即便错了，也错不到哪儿去。”

我认了这位老人为我的老师。

（袁宇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生》一书）



姜实节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真 李霞 孙烈举

蔡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铺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5年第20期

文苑

【卷首语】 1 / 河在峰头上流过 贾平凹

【文苑】 4 / 劳神父 杨 绛

12 / 蚕儿 陈忠实

37 / 剪网 丰子恺

52 / 学诗笔记 顾 城

【书林一叶】 6 / 粉红色大车 李 娟

【原创精品】 10 / 把手机借给陌生人 闫 红

人物

【人物】 14 / 云中的双子座 蓝英年

34 / 最远的距离 李筱懿

【名人轶事】 21 / 手拉手跑的幸福 沙叶新

47 / 看透 马 德

【回忆】 62 / 他们 路 明

社会

【杂谈随感】 8 / 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冯 唐

32 / 我的偶像李普曼 吴晓波

46 / 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 白岩松

65 / 为什么一定要有远大志向 流 沙

66 / 老在巴士 刘荒田

【话 题】 22 / 互联网征信时代来了 于靖园

【社会之窗】 30 / 大国空村 程明盛

人生

【人世间】 29 / 不发言，扛过去 刘 同

68 / 如果你有一名穷亲戚 石晓枫

【人生之旅】 20 / 光阴少一寸 崔永元

26 / 我的“节日” 童庆炳

28 / 绿皮火车 周云蓬

【婚姻家庭】 58 / 如果爱我，请给我写封情书 董小源

【两代之间】 18 / 没有忧伤的爱 刘 迪 王 一

42 / 从天而降的母亲 韩浩月

【青年一代】 45 / 自渡彼岸 雪小禅

生活

【心理人生】 64 / 你跟自己处得来吗 杨 照

【理 财】 57 / 炒股俱乐部里的组织学 何 帆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01期) 十月(下)

生活

【乐活】 50 / 移居办公室 特里·凯恩

【生活之友】 56 / 遇到困难你愿意求助吗 游识猷

文明

【在海外】 54 / 如果痛苦没有终点 罗拉·赫夫林格

【他山石】 71 / 德国孩子的地理课 程玮

【历史一页】 40 / 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武器 张明扬

【文化茶座】 70 / 我是怎么读书的 马未都

悦读

【幽默小品】 44 / 带着鲑鱼去旅行 安伯托·艾柯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4 / 东方意境 Thierry Bornier
48 / 小男孩和他的朋友 Mascotte

【话与画】 60 / 也许已是许多年 天朝羽 清河鱼

点滴

【意林】 53 / 盼情书 清少纳言
53 / 轻微美德 连岳
53 / 文明的精神 晏建怀
53 / 小斋 倪匡

【资料卡】 71 / 各种烂片奖

【点滴】 7 / 真实的幻觉 木心
9 / 听香 吴冠中
13 / 不是不能 古龙
16 / 完美的爱 村上春树
33 / 对比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的校训 龙应台
36 / 完美青春 陈丹燕
43 / 等春天 王鼎钧
67 / 负重心安 郝金红
67 / 故宫有多少把钥匙 于丹

互动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0)

艺术

【封面】 晚翠(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我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人是劳神父。什么缘故，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因为每次大姐姐带了我和三姐姐去看他，我从不空手回来。我的洋玩意儿都是他给的。不过我并不是个没人疼的孩子。在家里，我是个很被娇惯的女儿；在学校，我总是师长偏爱的学生。现在想来，大约因为劳神父喜欢我，所以我也喜欢他。

劳神父第一次赠我的是一幅信封大小的绣片，并不是洋玩意儿。绣片是白色绸面上绣一个穿红衣、绿裤、红鞋的小女孩，拿着一把扇子，坐在椅子上乘凉。上面覆盖一张卡片，写着两句法文：“在下学期用功上学之前，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送给你最小的妹妹。”卡片是写给大姐姐的，花式签名的旁边，画着几只鸟儿，上面还有个十字架的标记。他又从自己用过的废纸上，裁下大小合度的一方白纸，双叠着，把绣片和卡片夹在中间，上面用中文写了一个“小”字，是用了好大功力写的。我三姐姐得的绣片上是五个翻跟斗的男孩，比我的精致得多。三姐姐的绣片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我的那张至今还是簇新的。我这样珍藏着，也可见我真是喜欢劳神父的。

他和我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他和大姐姐说法语，和三姐姐说英语，和我说中国话。他的上海话带点洋腔，他和我讲的话最多，都很有趣，他成了我很喜欢的朋友。

他给我的洋玩意儿，确也是我家里没有的。例如揭开盒盖玩偶就跳出来的“玩偶盒”，一木盒铁制的水禽，还有一只小轮

船，外加一个马蹄形的吸铁石——玩时端一盆水，把铁制的玩具放在水里，用吸铁石一指，满盆的水禽和船都连成一串，听我指挥。这些玩意儿都被留在家里给弟弟妹妹们玩，就玩没了。

1921年暑假前，我九岁，等回家过了生日，就十岁了。劳神父给我一个白纸包儿，里面好像是个盒子。他问我知不知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我已经偷读过大姐姐寄放在我台板里的中译本《旧约》，虽然没读完，但对这个故事很熟悉。劳神父说：“好，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如下：

从前有个叫花子，他在城门洞里坐着骂他的老祖宗偷吃禁果，害得他吃顿饭都不容易，讨了一天，还空着肚子呢。恰好有一个王子路过，他听了叫花子的话，就把他请到王宫里，叫人给他洗澡，换上漂亮衣服，然后把他带到一间很讲究的卧室里，床上铺着又白又软的床单。王子说：“这是你的卧房。”然后又带他到饭厅里，饭桌上摆着一桌香喷喷、热腾腾的好菜好饭。王子说：“这是我请你吃的饭。你现在是我的客人，保管你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只是我有一道禁令，如果你犯了，将立刻被赶出王宫。”

王子指指饭桌正中的一盘菜——上面扣着一个银罩子，说：“这个盘子里的菜，你不许吃，吃了就会立即被赶出王宫。”

叫花子在王宫里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日子过得很舒服，只是心痒痒的，想知道扣着银罩子的那盘菜究竟是什么。过

劳神父

● 杨绛





了两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心想：我不吃，只打开一条缝闻闻。可是他刚开得一条缝，一只老鼠从银罩子下直蹿出来，逃得无影无踪了。桌子正中的那个盒子空了，于是叫花子立即被赶出了王宫。

劳神父问我：“听懂了吗？”

我说：“懂了。”

劳神父就一面把那个白纸包儿交给我，一面说：“这个包包是我给你带回家去的。可是你记住：你得上了火车，才可以打开。”我很懂事地接过了他的包包。

从劳神父处回校后，大姐姐的许多同事——也都是我的老师——都知道我得了这么个包包。她们有的拿来掂掂、摇摇，有的拿来闻闻，都关心地说：“包包里准是糖。这大热天，封在包包里，一定化了，软了，坏了。”我偷偷问姐姐：“真的吗？”姐姐只说：“劳神父怎么说的？”我牢记劳神父嘱咐的话，随她们怎么说、怎么哄，都不理睬。只是我非常好奇，不知里面是什么。

这次回家，我们姐妹三个，还有大姐姐的同事许老师，同路回无锡。四人上了火车，我迫不及待地要大姐姐打开纸包。大姐姐说：“这是小火车，不算数的。”（那时有个小火车站，由徐家汇开往上海站。现在早已没有了。）我只好再忍着，好不容易上了从上海到无锡的火车。我马上要求大姐姐拆开纸包。

大姐姐撕开一层纸，里面还裹着一层纸；撕开这层，里面又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纸是各式各样的，有牛皮纸、报纸、写过字又不用的废稿纸，厚的、薄的、硬的、软的……每一层都

用糨糊粘得非常牢固。大姐姐和许老师一层一层地剥，都剥得笑了起来。她们终于从十七八层的废纸里，剥出一个精致美丽的盒子，原来是一盒巧克力糖！大姐姐开了盖子，先请许老师吃一颗，然后给我一颗，给三姐姐一颗，自己也吃一颗，然后盖上盖子说：“这得带回家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吃了。”她又和我商量：“糖是你的，匣子送我行不行？”我点头答应。糖特好吃，这么好的巧克力，我好像从没吃过呢。回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尤其开心。我虽然是个馋孩子，但能和爸爸妈妈一家人同吃，觉得更好吃。

1930年春假，我有个家住上海的中学好朋友，邀我和另一个朋友到她家去玩。到了上海，我顺便回启明去看看母校师友，我大姐姐还在启明教书呢。我刚到长廊东头的中文教室前，依姆姆早在等待了，迎出来“看看小季康”，一群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跑出来看“小季康”。我已过十八周岁，大学二年级了，还什么“小季康”！依姆姆刚把学生赶回课堂，我就看见劳神父从长廊西头走过来。据大姐姐告诉我，劳神父知道我要到启明来，特来会我的。他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大胡子已经雪白雪白。他见了我很高兴，问我在大学里念什么书。我说了我上的课，内有论理学（逻辑学），我说的是英文logic，劳神父惊奇又感慨地说：“Ah! logique! logique!”我又卖弄了自己学到的一点点天文知识，什么北斗星有八颗星等等，劳神父笑着说：“欢迎你到我的天文台来，让你看一晚星星！”接下来他轻吁一

声说：“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儿死了。我不久就要回国，不回来了。”他说的“回国”是落叶归根的意思吧。他轻轻抱抱我说：“不要忘记劳神父。”我心里很难受，说不出话，只使劲点头。当时他八十岁，我十八岁。劳神父是我喜爱的人，我经常想起他。

我九十岁那年，钟书已去世，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瞬间想到劳神父送我那盒巧克力时讲的故事，忽然明白了我一直没想到的一点。当时我以为是劳神父勉励我做人要坚定，勿受诱惑。我直感激他为我防我受诱惑，贴上十七八层纸——如果我受了诱惑，拆了三层、四层，还是有反悔的机会，但是劳神父的用意，我并未理解。

我九十岁了，一人躺着，忽然明白了我九岁时劳神父那道禁令的用意。他是一心要我把那盒糖带回家，和爸爸妈妈一家人一起享用的。如果我当着大姐姐那许多同事的面拆开纸包，那么大姐姐得请每人吃一块吧？说不定还会被她们一抢而空，我不就像叫花子被逐出王宫，什么都没有了么！九岁听到的话，直到九十岁才恍然大悟，我真够笨的！够笨的！

我从书上读到，有道行的老和尚吃个半饥不饱，夜里从不放倒头睡觉，只在蒲团上打坐。想来劳神父也是不睡的，那样他才有闲空在赠我的糖盒上包上十七八层的纸。劳神父给我吃的、玩的，又给我讲有趣的故事，大概是为他辛勤劳苦的生活添上些欢乐的色彩吧！

（六月的雨摘自商务印书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李晓林图）



自从有了粉红色大车，我们去县城就再也不坐小面包车了。小面包车一个人要收二十块钱，粉红色大车只要十块钱。带稍微大点的行李的话小车还要另外收钱，大车随便装。最重要的是，大车发车有个准点，不像小车，人满了才出发，老耽误事。

粉红色大车其实是一辆半旧的中巴车。司机胖乎乎、乐呵呵的，每当看到远处雪地上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公路跑来时，就会快乐地踩一脚刹车：“哈哈，十块钱来了！”

车上的小孩子们则整齐地发出“吁儿——”的勒马命令声。

我和六十块钱被挤在引擎和前排座之间那点地方，车上已经

满满当当的了。可是车到温都哈拉村，又有人塞进来五十块钱和两只羊。这回我被挤得连胳膊都抽不出来了，真想骑到那两只羊身上去……好在人又多，没有暖气的车厢里便开始暖和起来。

虽然乌河这一带村庄稀寥，但每天搭粉红色大车去县城或者恰库尔图镇的人还真不少。每天早上不到五点钟车就出发了，孤独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漆黑的村庄，一路鸣着喇叭，催亮沿途一盏一盏的窗灯。当喇叭声还响在上面一个村子时，下面村子的人就准备得差不多了，穿得厚厚的，站在大雪覆盖的公路旁，行李堆在脚边的雪地上。

阿克哈拉是这一带最靠西边

的村子，因此粉红色大车每天上路后总是第一个路过这里。我也总是第一个上车。车厢里空荡而冰冷，呵气浓重。司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大声打着招呼：“你好吗，姑娘？身体可好？”一边从旁边座位上捞起一件沉重的羊皮坎肩扔给我，我连忙接住，盖在膝盖上。

夜色浓重，风雪重重，戈壁滩平坦辽阔，沿途没有一棵树。真不知司机是怎么辨别道路的，永远不会把汽车从积雪覆盖的路面上开到同样是积雪覆盖的路下面去。

天色渐渐亮起来时，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但还是那么冷。长时间待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空气里，我已经冻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看到第一排座位和座位前的引擎盖上面对面地坐着两个胖胖的老人——那里一定很暖和！我便不顾一切地挤过去，硬夹在他们两人中间的空隙里，坐在堆在他们脚边的行李包上。这下子果然舒服多了。但是，不久后我尴尬地发现，他们两个原来是夫妻……一路上这两口子一直互相握着手，但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没地方放，就搁在我的膝盖上；我的手也没地方放，就放在老头儿的腿上。后来老头儿的另一只大手就攥着我的手，替我暖着，嘴里嘟囔了几句什么，于是老太太也连忙替我暖另一只手。一路上我把手缩回去好几次，但立刻又被攥着了。也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总是那么凉……车上的人越来越多，不停地有人上车、下车，但大都是搭便车的——正顶着风雪从一个村子步行到另一个村子去，恰好遇到粉红色大车经过，就招手拦下。其

粉红色大车 ●李娟





实，就算是不拦，车到了人跟前也会停住，车门边坐的人拉开门大声招呼：“要坐车吗？快一点！真冷……”

周日坐车的人最多。车停下后，一位父亲先挤上车，左右突围，置好行李，拾掇出能坐下去的地方，然后回头大声招呼：“娃，这呐坐定！”又吼叫着叮嘱一句，“娃，带馍没？”

每每这时，司机总会失望一回——还以为这回上来的是二十块钱呢……那父亲安顿好了孩子，挤回车门口，冲司机大喊：“这是俺娃的车票钱，俺娃给过钱哩！俺娃戴了帽子，师傅别忘了哩！”

“好。”

“就是最后边戴帽子那哩！”

“知道了。”

“师傅，俺娃戴着帽子，可记着哩！”

“知道了，知道了！”

他还不放心，又回头冲车厢里一片纷乱的脑袋大吼：“娃，你跳起来，让师傅看看你的帽子！”

无奈此时大家都忙着上下车，手忙脚乱地整理行李，那孩子试着跳了几次，也没法让师傅看到他的脑袋。

“好啦好啦，不用跳了……”

“师傅，俺娃是戴帽子哩，俺娃车钱给过哩……”

“要开车了，不走的赶快给我下去！”

“娃，叫你把帽子给师傅看看，你咋不听！”

车在一个又一个村子之间穿行着，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人在等待。

有的是要坐车，有的则为了嘱咐一句：“明天四队的哈布都

拉要去县城，路过时别忘了拉上他。他家房子是河边东面第二家。”

或者是：“给帕罕捎个口信，还有钱的话就买些芹菜吧。另外让他早点回家。”

或者：“我妈妈病了，帮忙在县城买点药吧。”

或者有几封信拜托司机寄走。

车厢里虽然拥挤，但秩序井然。老人们被安排在前几排座位上，年轻人坐在过道里的行李堆上，而小孩子们全都一个挨一个挤在引擎盖子上，那里铺着厚厚的毡毯。虽然孩子们彼此间互不相识，可是年龄大的往往有照顾大家的义务，哪怕那个年龄大的也不过六七岁而已。只见他一路上不停地把身边一个三岁小孩背后的行李努力往上推，好让孩子坐得稳稳当当。每当哪个小孩把手套脱了扔掉时，他都会不厌其烦地拾回来帮他重新戴上。

还有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孩一直坐在我对面，脸蛋绯红，蔚蓝色的大眼睛静静地瞅着我。他一连坐了两三个小时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动都不动一下，更别说哭闹了。

我大声问：“谁的孩子？”

没人回答。车厢里一片鼾声。

我又问那孩子：“爸爸是谁呢？”

他的蓝眼睛一眨都不眨地望着我。

我想摸摸他的手凉不凉，谁知刚伸出手，他便连忙展开双臂向我倾身过来，要让我抱。真让人心疼……这孩子身子小小软软的，刚一抱在怀里，小脑袋一歪，就靠着我的臂弯睡着了。一

路上我动都不敢动弹一下，怕惊扰了怀中小人儿安静而美好的梦境。

（伯仲摘自新星出版社《阿勒泰的角落》一书，李旻图）



真实的幻觉

●木心

我一向知道樱花是不香的，亦未闻有谁道及樱花之芬芳。

在华盛顿的人工湖畔，沿岸樱花连绵，远远望去，云兴霞蔚，走近时一阵清甜的幽馨，不能不怀疑自己的嗅觉了。

上午时分，空气潮润，地面的草茵朝露未干，阳光从前面的乔木间照进来，也许就是这样，水分慢慢蒸发，才形成馥郁的氛围。

樱花含苞时是深红的，徐徐绽放，颜色渐浅渐淡。盛开时的樱花是浅绛色的，近乎白的樱花就要凋谢了。这样，我所闻到的腌馞的樱花正是浅绛色，再往前行，樱花都已变白，无气息了。

十多年来没有逢过如此规模的嗅觉佳境——嗅觉比视觉更轻捷透彻，直抵心灵。

仍然有些疑惑，小湖畔樱花之香是一己的幻觉，那么我的感官已经病得可喜可贺。相信我记住了樱花的香型，能与梅花、梨花等其他花区别得清楚。

（青云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素履之往》一书）



●
冯
唐



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要有十个要素。

第一，房间面积要小。一卧，最多两卧，多出来的一个卧房当客房，或者等小孩儿长到青春期要求自己睡时用，或者偶尔夫妻吵架需要分房睡时用。每个卧房不超过十平方米，乾隆帝的卧房也不过十来平方米，平常人王气更弱，不僭越。卧室里最好有大些的衣橱，常穿的衣服可以挂起来，旅行箱也可以藏到视线之外。一厨。如今的女性追求平等，做完饭不洗碗，所以要有洗

碗机。要有烤箱，不做饭的时候可以烤鸡翅和羊肉。一起居室。一桌，六到十把椅子，吃饭、喝茶、看书、写作都有地方了。最好有个真壁炉，天冷的时候点起一把火，心里就踏实了。最好再有个宽大的单人真皮沙发，中饭之后，瘫在里面看书，被书困倒，被夕阳晒醒，午睡前的内容都记到脑子里了。这样算下来，一百平方米足够了。如果嫌小，想想，多出来的面积和房间你一年也去不了几次；想想，面积小，好打扫。如果还嫌小，就

减东西，一年以上没碰过的东西，理论上讲都可以扔了。

第二，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有树，最好是果树或者开花的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的。自家的果子长得再难看也甜。哪怕花期再短、平时打理再烦，每年开花的那几天，在树下支张桌子，摆上简单的下酒菜，开瓶顺口的酒，看繁花的风里、在暮色里、在月光里动，也值了。要有动物，大大小小的鸟用不同“方言”叫，松鼠、野猫、鹿不定时地来看看你在读什么书。它们知道你没有杀心，见你靠近也不躲避，只稍稍侧身，让你走过去而已。

第三，要有好天气。不要太干燥，不要太湿，冬天不要太长，夏天早晚不要太热。

第四，要有景色。尽管你天天看，但是景色依旧重要，或许正是因为你会天天看到。如果你的眼睛足够尖，你会发现，尽管你天天看，景色每天都不一样。每天看看不一样的云，想想昨晚的梦，和自己聊一会儿天，日子容易充盈起来。

第五，附近要有公园。越近越好，走路三五分钟能到最好，如果开车才能到，不能算房子附近有公园。公园不用很大，有简单的草坪，一圈二三百米，能跑步就好。人过四十，不再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反而似乎总有拉不开的筋骨，跑步是解药。每天跑跑，三五千米，汗出透，整个人都好了。

第六，附近要有大学。最好走路能到，最好是个像样的好大学。有大学就有图书馆，有看不完的书可以蹭着看。有大学就有苍蝇馆儿，而且开到很晚，一年

1980年的春天，我带领一班学生到苏州留园写生，园林里挤满了人，行走很困难，走不了几步，便有人嚷嚷：“同志，请让一让！”原来他们在拍照，那国产的海鸥相机大概价格便宜，很普及，小青年都在学照相。

那些姑娘拍照时真爱摆姿势，有斜着脑袋扭着腰的，有一手捏着柳叶的，有将脸庞紧贴着花朵的，她们想在苏州园林里留下自己最美丽的身影吧！园林里有什么好玩呢？于是嗑瓜子、吃糖果、打扑克……与其说听音乐，倒不如说显示自己手上提了新式录音机吧。满园都在播放邓丽君的歌，邓丽君成了园林里的歌星——不，是皇后！



听 香

●吴冠中

学生们诉苦了——无法写生，我只好采取“放羊”措施，宣布“自寻生路”。

到了晚上，我的研究生钟蜀珩

不见了，她回来得特别晚。她躲进了园林里一个极偏僻的角落，藏在石头的后面，悄悄地画了一天。关门的时候值班人员未发现她，她也没注意园林在什么时候关门了，当她画完时已无法出园。她在园里来回转了好几遍，寻不到出园的任何一个小门，最后只好爬到假山上，对着园外的一个窗户呼喊，才引来管理员开了门。她说，她在园里转了一个多小时，没遇见一个游人，她才真正感受到了园林的幽静之美。

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真羡慕她遇见了园林的幽灵！狮子林的走廊里写有两个字“听香”，道出了园林的美之所在。

（潘光贤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8月4日，吴冠中图）

到头都有便宜的好吃的。有大学就有教授，要张课程表，去蹭大课听。有大学就有女生，花落了，还可以在校园里看女生。

第七，附近要有足够好的生活设施。最好有几家好餐馆，开了几十年，食材新鲜，厨师可靠，菜好到你常吃不厌，懒得做饭了就可以不做。最好有几家好咖啡馆，豆子现磨，闻香进门，餐点都让人惦念。最好有一两家走路就能到的独立书店，时常能翻翻新书，每次能买到一两本过去一直想读但是没机会读的旧书。小学和中学都在走路可达的范围内，否则接送小孩儿上下学就会消耗掉你不多的自由时间。多数病都是年纪大了之后得的，老了之后，医院是必需的。医院最好走路能到，建筑不必雕梁画栋，等候时间不长就好，医生能

不乱开药、能多和你解释病情、能体会到你的痛苦就好。

第八，所在城市要有历史。最好百年以上，连续不断。有很多古董店，家具、瓷器、餐具，买了就在日常的生活里使用。一年下来，在古董店买的东西比网购的还多。有不少博物馆，一些古迹，偶尔逛逛，觉得祖先并不遥远。

第九，一个小时车程之内有国际机场。人偶尔还是要出去走走，度假、会友、凑热闹。

第十，附近要有朋友。最好有很多朋友。朋友们就散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不用提前约，菜香飘起时，几个电话就能聚起几个人。酒量不同，酒品接近；术业不同，三观接近。菜一般，就多喝点酒；酒不好，就再多喝点，很快就能高兴起来。一生中，人

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这第十点是最重要的一点。老舍先生您如果还健在，您在哪里，北平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北平。所以如果看上一处房子，买了下来，让房子变得更理想的捷径是鼓动好朋友们也在附近买房，共我山头住。

当然，这十点之前，有些更基本的要求：空气是干净的，水是能喝的，食品是能吃的，无论什么时候在街上走都是安全的，没有什么组织是能不依法就把你从你的房子里带走的。有时候，这些要求看上去是如此基本，但是有时候，又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

（欣然摘自《中国妇女报》2015年8月2日，喻梁图）



带我妈出门旅游，我让她充分认识到了互联网时代的神奇。比如出了火车站，她要买一张地图，我拦住了她，掏出手机，打开一个地图软件，搜索我们要去的地点，屏幕上不但立即出现多条公交线路，还会告诉你怎样到达公交站，而且不必分辨东西南北，只要将手机转个方向，就能从箭头的变化，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们去的一个景点在荒郊野外，晚上九点之后出来，人们纷纷奔向私家车停车场，路上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当我妈难以避免地惊慌起来时，我又掏出手机，打开打车软件，让我妈看到系统已经通知了附近的一百多辆出租车。但这地方毕竟偏远，没有司机接单。没关系，加小费啊，从三块加到五块，再到十块。很快，就有一辆出租车打着红灯，像挪亚方舟似的，从黑暗的汪洋大海里驶来了。

我还给我妈表演了手机购物、手机买基金等等，我妈赞不绝口，同时不甘心就这么出局，我答应到酒店后，首先教她学会使用微信。

直到这时，气氛、大家的心情与状态都非常好。可是，在回家前的那个下午，一件破坏气氛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我扶老携幼穿过武汉长长的步行街，走累了，在树下的长凳上，一边休息，一边习惯性地刷手机。忽然，一个坐在旁边的女孩转过头来，问：“你的手

受——我的手机也常常没电，我也记不住别人的手机号。在这样人潮涌动的步行街上，和同伴走散确实是件很麻烦的事，没准哪一天，我也会想跟人借一下手机。

你看，这就是长期写稿留下的职业病，我非常善于脑补，脑补的结果就是我不可能不借给她。但把手机递过去时，我的紧张达到了极限，因为我到这时才想到，她不一定要抢劫，她也可以在我的手机上操作，比如下个木马病毒什么的。

也许是那一刻太紧张了，我非但没有把手机要回来，还遵循着一向的习惯，不伸头看别人输入，只是紧张地盯着她飞快地在我的手机上戳戳点点，每一下都指向我无法确知的所在。同时我打量着她——棕色的挂着皮熊吊饰的包，粉红色的运动鞋，白皙的面颊上有一颗小痣，我要求自己记下这些特征，同时也知道这样其实没什么用。

拿回手机，我完全没有助人为乐的好心情，反而觉得我遇上

把手机借给陌生人

● 闫红

机能借我上一下QQ吗？我的手机没电了，我跟同学走散了，我记不住她的手机号。”

我顿时有点紧张，我知道借手机是大忌，报纸上不是老有某人把手机借人然后手机被抢走的新闻吗？但这个女孩看上去很文弱，不见得身手就有那么敏捷，况且，她说的这种处境我感同身





了大麻烦。我不知道这几十秒里，她把你的手机怎么着了。我打开支付宝，看到我的钱还在，但她也许是还没跑远，怕被我抓住吧，会不会半夜三更才开始行动？是否她躲在一个难以想象的角落里，把我的支付宝、银行卡上所有的钱，一笔一笔地全转走？

一半是为了解疑惑，一半是求安慰，我把我的遭遇发到微博与微信朋友圈，瞬间有许多人回复，大多是告诉我“你摊上大事了”。很多人建议我立即将所有账户冻结，然后将手机资料备份，再恢复出厂设置，可操作这些严重超出我的智力范围，何况我还在旅途中。也有人说：“防人之心过重也不好。”这话我爱听，也符合我的风格，可是如果坚持风格会导致大笔钱财损失，我想还是先把风格放到一边比较好。

我万分纠结，几乎没有心情继续旅行，最后决定，还是先把支付宝和银行账户全部冻结比较好。

于是，当我妈和我儿子坐在剧场里，为精彩的演出大笑或是惊叹时，我动用我智商的全部库存，手忙脚乱地将我所有的账户冻结。总算忙完，演出也结束了，跟着人流涌出剧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微信绑定的银行卡被冻结，我没法用打车软件了。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地铁站，出了地铁站又等了很久，才等到一辆空出租车。回到酒店，我以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于是洗了澡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生活对我的考验

刚刚开始。

第二天，我还没睁眼就抓过手机，倒是没有多笔取款信息，可一条来自12306的短信让我飞快地坐了起来，只见上面简单粗暴地写着：“您购买的×月×日×次列车因故停运，××、×××需在×月×日前到铁路车站办理原价退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谅解什么啊，这不是假客气吗！最要命的是，这张票我之前改签过一次，现在只能退票。被冻结的支付宝账户只能进不能出，我要是想再买一张票，就只能去火车站了。

我满腹怨气地赶到火车站，排了很久很久的队，一直在纠结是改乘汽车还是买两张站票——在我前往火车站的路上，我看到当天的坐票在一张张减少，直到为零。等我终于排到售票口，我一咬牙，决定还是站着回去，因为坐火车只要两个半小时，坐汽车却要五个小时呢。

拿着两张站票，我悲壮地对自己说，就当是参加一档真人秀节目吧，能圈粉的明星通常都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稳定的情绪。好容易做好足够的心理建设，再拿手机上12306一刷，惊讶地发现，我退票的那趟车又出现了，只是换了个马甲，它重新运行了，并且重新卖一次票。

只能再去排队改签，因为我知道这站票可不是让你两只脚站着，常常是一只脚点着地，有时甚至无立足之地。虽然被“铁老大”耍了一下，但勉强也算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

就这么着，又排了将近一个小时队，才把站票改签成了二等座票。拿到票的时候，我简直热

泪盈眶，一方面更加怨恨昨天向我借手机的那个女孩子，另一方面，看着眼前排着长队的人，大多不修边幅，想来多半没有或是不善于使用一些软件，对于这种处境已经习以为常。网络固然能够提高效率，但对于最底层者，也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剥夺。

千辛万苦到底回到了家，长吁一口气之余，我开始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我得说，这事儿比我想的要麻烦得多，我完全不得其门啊。我在网上查了流程，但还是点哪儿都点不动，几次不成功，我恼羞成怒：就不恢复了，看能咋样吧。

从我做出这个决定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月了，这期间，我将支付宝和银行卡账户都解了冻，到目前为止，我的钱财还没有流失。难道“坏人”在默默地等我攒钱，到了一定额度再下手？万一我突然清空了呢？这当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比较合理的情况是：那个跟我借手机的姑娘，可能就是想用我的手机上一下QQ。

网络时代，人们的交流变得如此容易，天南海北的朋友，住在你的微信或是微博里，比隔壁还要近，不用敲窗就能窥见对方的衣食住行；另一方面，这种便捷性，却又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壁垒高筑，从身边掠过的每一个人，可能片刻就成你的地狱。这不怪人性，高效是把双刃剑，它带来种种便捷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对于此事，我无话可说，唯一可以总结的是，若下次再有人这么跟我求救，除了输入密码的环节，我一定会盯紧对方在我手机上的每一步操作。

（黎青图）



蚕儿

◎陈忠实

从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摊开，把一块缀满蚕子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教室，坐在课桌旁，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走进来，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其他年级写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口诀表挂在黑板上，领我们读起来：“一六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一下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我想把那棉团儿掏出来看看，但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房檐下，展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我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

到早已备好的小铁盒里。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上课的哨声响了。

“二年级写字。”

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我取出鸡毛，揭开小铁盒。

嘣，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我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老师背着双手，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一下踩扁了那个小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子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过了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一、二年级被分给他教了。

他很年轻，站在讲台上，笑着介绍自己：“我姓蒋……”捏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小学，之前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自报姓名，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那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桑叶，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脸上擦出血了。

“你干什么去了？脸上怎么弄破了？”蒋老师吃惊地问。我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他牵着我的胳膊走进他住的小房子，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

“怎么弄破的？”他问。“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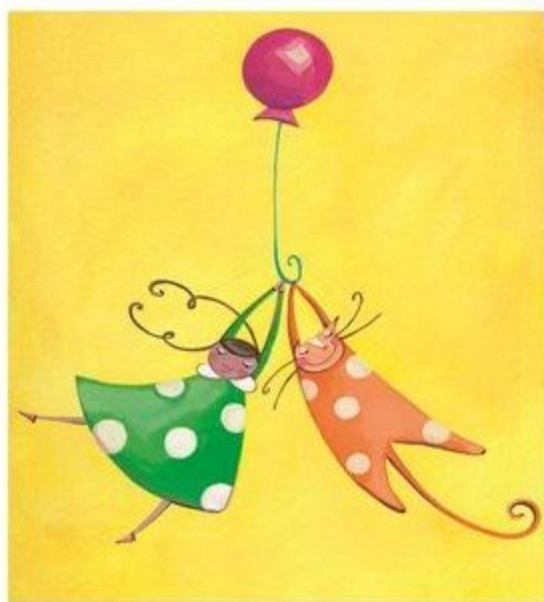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有人说，快乐是不能分享的，因为让你快乐的事，别人并不一定会觉得快乐，有时反而会觉得嫉妒和怨怼。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至少我觉得，快乐并不是不能分享的，因为你让人分享到的，并不是那件令你快乐的事，而是一种快乐的气氛。

有一句已经快老掉牙的话：“快乐与香水，能令自己芬芳，也能令别人愉快。”

如果你心里快乐，就会显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别人自然也会受到你的鼓舞而振奋起来。如果你一定要学英国的顽固绅士，或者像我们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一样，认为喜怒不形于色才算



不是不能

●古 龙

君子风度，那么别人当然也不能一口把你咬死。

最可怕的是，有些人非但不愿意让别人分享他的快乐，而且不愿意让自己快乐起来，日日月月，每一天他好像都能找出让自己不快乐的理由来。

春天他总是要伤春，秋日他难免悲秋，失意时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得意时又怕半空中一跤从青云里跌下去，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哪里能笑得出来。

遇见这种人，最好的法子就是赶快溜之大吉。 ❀

（六月的雨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谁来跟我干杯》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他高兴了，笑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而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他领着我们满山沟跑，摘桑叶。有时候，他在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笋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个小方格，把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

兴得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可没过多久，老师却被调走了。他说：“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

我于是想到村子里的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一点儿先生的架势嘛！失了体统嘛！他们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碰到了蒋老师。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的纪念章，金光给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我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所小学里教书。当老师的第一个春天，我就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带着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蒋老师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了上面…… ❀

（林冬冬摘自广州出版社《陈忠实文集》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云中的双子座

◎蓝英年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翻译《日瓦戈医生》。记得翻译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时，我曾激动得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暴风雪袭击旷野中久无人住的住宅，四周渺无人迹，只有四只狼对着室内的灯光嚎叫。栖身室内的日瓦戈医生和拉拉陷入绝境，等待他们的不是逃脱便是死亡。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两颗相爱的心互相温暖、支撑。拉拉的原型便是伊文斯卡娅，日瓦戈同拉拉的爱情，便是诗意化的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的爱情。

邂 逅

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在欧洲文学艺术领域造诣很深，还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与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类。但不知为何，他受到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树为诗人的榜样。

1935年，斯大林用去世已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取代帕斯捷尔纳克。1938年布哈林被处决后，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当中完全被孤立。无产阶级作家不屑于同他交往，他们对他也敬而远之。与他同属异类的作家不敢同他交往。例如，同他教养相似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因丈夫和儿子被捕而自身难保，怎敢再牵连他。在家庭中，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孤独。第二任妻子奈豪斯当初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帕斯捷尔纳克，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使他们难以在精神上产生共鸣。

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灵渐渐干涸，亟待友谊的甘露。不久二战爆发，他同全体苏联人民一起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一起上前线，并获得一枚奖章，暂时忘却了内心的孤寂。

1946年，他乘着这股清新的风开始写《日瓦戈医生》。就在这一年，他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的编辑部结识了伊文斯卡娅。伊文斯卡娅到底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娅热爱的诗人、崇拜的偶像，亲眼见到他，她

激动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也被伊文斯卡娅超凡脱俗的美貌所震撼，两人目光一接触便激起心灵的火花。

几天后，帕斯捷尔纳克便把自己所有的诗集签名赠送给伊文斯卡娅，并请她到著名钢琴家尤金娜家听他朗诵《日瓦戈医生》前三章。伊文斯卡娅觉得，第二章中的拉拉气质与自己非常相似。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就以她为原型塑造拉拉，把伊文斯卡娅的经历写入拉拉的形象中。伊文斯卡娅的第一任丈夫在大清洗中被迫自杀，第二任丈夫病故，她与女儿伊琳娜相依为命。拉拉的丈夫也是被迫自杀，她同女儿卡佳厮守在一起。



此时，伊文斯卡娅34岁，帕斯捷尔纳克56岁，但年龄的差异未能阻碍他们相爱。

孤 立

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力超过苏联国内许多走红的作家。自1945年至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苏联作协的领导想方设法压制帕斯捷尔纳克，不发表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见诗作无法发表，便以译书维持生计。他所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威望反而增高。

作协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阻止他写《日瓦戈医生》，1949年10月9日逮捕了伊文斯卡娅，罪名是她伙同《星火》杂志副主编奥西波夫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无力拯救自己心爱的人，除悲痛和思念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小说创作中。帕斯捷尔纳克被传唤到警察局，民警把从伊文斯卡娅家中抄出的诗集退还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取，声明诗集是他赠送给伊文斯卡娅的，已不属于他，应物归原主。

帕斯捷尔纳克的倔强态度，使监狱里的伊文斯卡娅更加受罪。审讯员对她连轴审讯，刺眼的灯光通宵对着她的眼睛，他们不让她睡觉，一直折磨她三天三夜，逼她交代“犹太佬”的反苏言行。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太人，审讯员都管他叫“犹太佬”。为了压下她的“气焰”，审讯员把她关入太平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已死。伊文斯卡娅并不害怕，她一一揭开尸体上的白布，发现没有自己的爱人，反而增加了对抗的勇气。

归 来

这时审讯员发现她怀有身孕，便不再审讯她，把她送进波季马劳改营。她同女劳改犯用铁镐刨地时流产了，这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娅在劳改营里被关了五年，到1953年才被释放。

伊文斯卡娅在劳改营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同她联系，每次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就痛不欲生，写了不少思念她、赞美她的诗。

伊文斯卡娅被释放后，帕斯捷尔纳克急于见她又怕见她，不知五年的牢狱之灾会把她变成什么样子。帕斯捷尔纳克见到伊文斯卡娅时惊喜万分，劳改非但未摧毁她的精神，也未改变她的容颜，她依然楚楚动人。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伊文斯卡娅不

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拉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伊文斯卡娅的经历丰富了拉拉的形象。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娅负责，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奈豪斯无法胜任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两个女人的态度，同日瓦戈对妻子冬尼娅和拉拉的态度一样，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同她离异，因此也无法同伊文斯卡娅正式结合。

出 版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日瓦戈医生》，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帕斯捷尔纳克，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反苏反人民的倾向。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这部小说。

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从伊文斯卡娅那儿读到手稿，欣赏备至，把手稿悄悄带回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他同帕斯捷尔纳克商洽，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娅又去找文学出版社，恳求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甚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遭拒绝。

这时被称为“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出面了。他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向费尔特里内利索回手稿。帕斯捷尔纳克按照苏斯洛夫的指示做了，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苏斯洛夫亲自飞往罗马，请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出面干预，因为费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没料到，费尔特里内利抢先一步退党，并在1957年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1958年西方最畅销的书。

苏联领导人震怒了，作家和人民愤怒了，大概不完全由于小说的内容，因为他们可能谁也没读过这部小说，而是由于苏斯洛夫亲自出马仍未能阻止小说出版，丢了面子。

总之，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可几乎谁也没读过这部小说。

获 奖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58年



“你想要一份完美的爱？”

“也不是，我没有资格要求那样，我追求的是一种单纯的真情，一种完美的真情。比方说，现在我跟你说明我想吃草莓蛋糕，你就丢下一切，跑去为我买，然后气喘吁吁地回来对我说：‘阿绿，你看，草莓蛋糕！’你把蛋

完美的爱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 译

糕放到我面前。但是我会说：‘哼！我现在不想吃啦！’然后就把蛋糕从窗子丢出去。我要的爱

情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和爱情完全没有关系嘛！”我稍稍愕然地说。

“有啊！只是你不知道罢了。”阿绿说道，“对女人来说，其中有很重要的意义！”

（清 翠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挪威的森林》一书）

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诗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激：“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丘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两位邻居向帕斯捷尔纳克祝贺。

次日清晨，第三位邻居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不理睬正在厨房准备早餐的奈豪斯，径直上楼走进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逼他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然作协就开除他；并让帕斯捷尔纳克到他家走一趟，苏共中央文艺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正在那里等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发表声明，也不肯同费定去见波利卡尔波夫。

他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我将转赠给保卫和平委员会。”

拒 绝

然而仅仅过了几小时，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娅通过电话后，立即到邮局给瑞典文学院拍电报：“鉴于我所隶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与此同时，他也给苏共中央发了份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

为捍卫荣誉，帕斯捷尔纳克不畏惧死亡和流放，但荣誉在爱情面前黯然失色。为使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听命于领导的群众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的煽动下，在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前示威，用石块打碎门窗玻璃，呼喊着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口号。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直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声称他本人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很可能被驱逐出境了。在一连

串猛烈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憔悴，一蹶不振。

身 后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溘然长逝。官方当然不会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只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连他是诗人、作家都不提了。他的诗歌爱好者在作家村贴出讣告，被民警揭掉后重新贴上。

帕斯捷尔纳克下葬的那天，千百万人涌向他的住宅同他告别。奈豪斯不准伊文斯卡娅同他告别。伊文斯卡娅在大门前站了一夜，只能从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柩。此时她五内俱焚，晕倒在地。但她万万没料到，等着她的是更大的磨难。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伊文斯卡娅和她20岁的女儿伊琳娜同时被捕，罪名是向国外传递手稿并获取巨额稿酬。伊文斯卡娅除了在莫斯科给意大利出版商看过《日瓦戈医生》手稿外，从未向国外传递过任何手稿，至于稿酬更是一个戈比也没领取过。当局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怨气，都撒在伊文斯卡娅身上。伊文斯卡娅被判入狱四年，女儿伊琳娜被判入狱两年。

赫鲁晓夫下台后，伊文斯卡娅才被释放。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相爱13载，共同经历了人生旅途的惊涛骇浪。她把这一切都写入回忆录《时间的俘虏》，书名取自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休 芸摘自《南方周末》2015年7月16日，李 晨图）



8.2%的“90后”女生已经有了一套甚至多套房产。

——据《2015中国女性理财白皮书》显示，拥有人生第一个10万元的过程，“90后”比“80后”短2.8年。16%的“90后”月收入超过了5000元，而“80后”里有68%的人月收入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有才且高调，是强人；有才且低调，是能人。强人令人畏，能人使人敬。

——强人智商高，情商低；能人智商高，情商亦高

我不爱旅游，再美的风景，也比不过你的发梢。

——动人情话

你在乎别人的评价，要么你站得不够高，要么你在做淘宝。

——网络趣语

你是想让我们过美国时间吗？

——三大运营商推出提速降价方案，但“夜间流量”遭遇很多人吐槽

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农村老师被指地位低，四川一个留守少年用蔑视的口吻描述自己老师是“被淘汰产品”

2014年，瑞士人平均乘坐火车里程数达2288公里，日本则以2042公里屈居亚军。

——根据国际铁路联盟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瑞士人蝉联“乘坐火车世界冠军”。另外，在



年均使用火车出行频率排行榜上，日本以72次高居榜首，瑞士以59次名列第二

当你心中站着—个审判官时，文章只能是套子里臊眉耷眼的蠢物。

——学者杨早《高考作文，安全第一》

这是她自己的想法，我从来没有干预过，我认为她会做好的。澳大利亚的女性都很独立，也包括我的女儿。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女儿在天猫国际开店，售卖澳洲特产，对此，陆克文评价道

收入不匹配易造成婚外情。

——在调研了2700名青年10年来的婚姻和性行为数据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汀·穆希发现：在妻子经济强势的情况下，21%的男性会通过婚外情来进行心理补偿；在男性经济强势的情况下，则有10%的女性会出轨。而这类出轨家庭却少有离婚现象

通过幻想，孩子能够宣泄情

绪，这是他们驯服野兽的最好方式。

——图画书大师莫里斯·桑达克谈怎样通过共鸣化解孩子的不良情绪

看到宁泽涛，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刘翔的故事。

——姚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他认为体育应当塑造“英雄”而非“偶像”

申不申遗，叉烧包就在那里，味道自己会说话，但背后对美食的认真劲不能丢。

——广州人大爱的叉烧包入选越秀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网友这样指出

“别惦记我”“忙你的吧”“我不缺钱”……

——做儿女的若听到父母的这些话，请好好琢磨一下其中隐含的情感

我时不时会遇到一个20多岁的“数字化原住民”在阅读报纸，我立马认为他拥有光明的前途。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斯卡平克说，美国的研究表明，如今仍然阅读报纸的人的收入更高，受教育水平也更高。当人们使用手机阅读时，只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看纸质报纸时，会看到一些之前不知道自己会感兴趣的内容

请不要撬这个房门了，有钱的话，就不用租房子住了。

——长春一住户在大门上给小偷贴了张留言

（雪茹、汪杰、聃尘等摘）

◎ 刘
迪
王
一

没有忧伤的爱

《没有忧伤的爱》与《老妈来美国》的两位作者是母女，她们对“离别”有各自的反应与不同的理解。——编者

女儿去美国之前，我问她：“你会想我吗？”她说：“不会。”尽管不悦，但我知道，除了母爱，世界上一定有更好的东西在向她招手。

人生自古伤别离。分别时，她满脸喜悦，我却泪眼婆娑。她不让我去机场，她怕我哭。她觉得分别没什么好哭的。

我心想：别嘴硬，还没到时候嘞！总有一天你会泪流满面地对我说“我想你”。

孩子喜欢往外跑，向远方，向梦想中的自由。其实，我们自己又未尝不是呢？父母的钱给他们插上了翅膀，我们愿意这样，这也是为我们自己的理想。

到了美国，她似乎比我想的要忙，忙学习，忙玩，什么都不想放过，只有妈妈这边是可以放放的。甚至我想和她视频都抓不到她。我抱怨：“你总得吱一声呀！好叫我们知道你都好。”于是，她在微信上时而发一个字“好”，时而两个字“都好”，或三个字“都很好”。

一晃，半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等，但她终究没说“我想你”这三个字，这叫我既失落又欣慰。甚至第一个暑假她都没回来，她申请了学校的一个项目，去了波士顿大学的英国伦敦分院和爱尔兰都柏林分院，余下的时间，她又独自去了荷兰、比利时……回到美国，她欣然地告诉我，她过了一个很忙的暑假。

说来也怪，她不想我，但我还是一厢情愿地想她，我甚至想要去看她。她说：“还是等我毕业时再来吧！那时我会带你好好玩玩。”听这语气，我们似乎已经转换了角色——今后是她带我玩了。

时光飞逝，她即将毕业，我开始筹备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去之前，我问她想要我带些什么给她，她说什么都不要。我又问：“吃的用的都不需要？”她说：“那就带个挖耳勺吧！”

她几乎在毕业论文完成的同时，开始制订我们的美国东海岸旅游计划，然后把行程表发给我征求意见。接着订机票、订游轮票、订宾馆、租车……当我飞过太平洋，又横跨美国本土，到达东海岸的波士顿罗甘将军机场时，女儿已经等我一个多小时了。我们打车回到公寓，女儿便一头扎进厨房。一刻钟后，饭菜便魔术般地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喜欢这样的见面礼，到美国第一顿就吃上了女儿亲手烧的菜。她告诉我，红酒牛肉是接我之前烧好的，里面还有洋葱、胡萝卜、芹菜和各色香料，色香味俱佳。意大利面是现做的，插空还做了个牛油果色拉。烧牛肉剩下的半瓶红葡萄酒我俩一人一杯，庆贺母女欢聚。我发现她的手腕内侧有一道红色的烫痕，我问：“怎么弄的？”她拉下

衣袖不让我看，说：“就是忙的呀！”

此时是波士顿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也是学生们毕业的季节。马路两旁的树上开满红白相间的樱花，不时能看到穿着耀眼红袍的学生在纷飞的落英中穿行。

接下来，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游玩。毕业典礼这天，我抱着满怀的玫瑰坐在看台上，等待女儿的出现。终于我看到他们结队翩翩而出，红色的袍子像翻卷的浪花，满场的人都在欢呼，而我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流泪……转眼就到了要走的日子，我仿佛进入流泪模式，万般不舍。在机场分别前我问：“你会想我吧？”她不假思索地说：“不会。”我问：“你爱妈妈吗？”她说：“爱！”我又问：“爱我，为什么不想我呢？”她说：“有爱就够了，我的爱里没有忧伤。”飞机跃升，眼前出现广袤的云海。我突然领悟，生命是天地的造化，我们不过为天地代孕而已。女儿执意远行，为的也许就是天地大爱的召唤。但愿这种召唤，让女儿在面对人生各种离别时，没有忧伤，让爱长存。

老妈来美国

我的母亲很早就计划来美国参加我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在她来之前，我在焦头烂额地赶毕业论文，并且已经提前开始准备毕业之后的求职计划，所以平心而论，我是非常繁忙的。我真心为她可以来看我而感到高兴，一来是她可以同我一起庆祝一年半的学习成果，二来是她可以看看美国东海岸风光，而夏天正是这里最美的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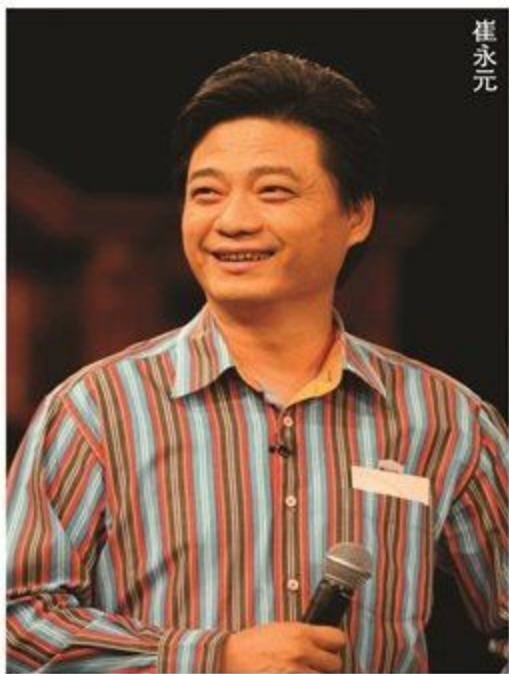
她乘香港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上海途经香港，最终降落在波士顿。我大学时曾经在香港参加过一学期的交流项目，前后在香港待了近半年，其间她也来看过我一次。当时我让母亲一人在香港街头等候了近两个小时，原因是前一天晚上复习备考，第二天睡过头，没赶上和她约好逛街的时间。那时的我毫不懂事，被母亲责备完就将此事抛在脑后。这一次想到母亲要一个人乘坐十几个小时的跨洋飞机来看我，其间还要在香港停留几个小时，我很是放心不下，从她告知已经从上海登机后，我就一分钟都没有睡着过。她游历各国，独立自信，沉稳大方，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仍然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我想起在香港的一幕幕，突然翻身坐起，对自己说：“哈，糟糕，你真的长大了呀！”

在波士顿罗甘将军机场等待母亲时，我告诉自己要在旅行全程中做到随时 Joie de vivre——这是一个英文中的法语外来词，非常“专业”的翻译就是：要欢乐，要搞笑。第一眼在机场见到她时，我就发现我的计划事倍功半。在一群疲惫的人中我一眼锁定了我的母亲，她高举护照，散发着十八岁的精气神儿，面带着微笑疾步向我冲来。

但是很快地，母亲就进入了啼哭模式。我觉得她在我毕业典礼当天的表现将会永久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母亲独自坐在观众席间，而我则在闷热而喧闹的礼堂排队等待进入典礼的主会场。漫长的等待换来的是数以千计的合影，这是检验你在学校受欢迎程度的时刻（与个人学术成就毫无关系）。女生一边擦拭着被汗水晕开的眼线，一边热情洋溢地邀请所有认识的人合影，试图留下足够多的影像资料。我正左右逢源地参与着拍照，突然听到前方一声高喊：Show time（好戏上演）！很快，我们进入了主会场。母亲事后说，伴随着入场音乐，她已经泪眼婆娑。而我所记得的是不远处有一个欢乐的人久久地向我挥手，不曾间断。在校长发言之前，坐在我旁边的同学微笑着对我说：“你看，观众席中有一位女士一直向我挥手，真可惜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认识她的。”我大笑解释她是我的母亲，并号召整排同学集体向她挥手，母亲微笑着举起了相机。在美国对于毕业典礼有这样一个说法：同学们可能会记得谁是自己毕业典礼的荣誉发言人，但他或她具体说了什么，很快就会被全体毕业生忘记。时隔两个月，我仍旧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发言人告诫我们：“享受人生，但同时，在毕业之后，你将是对你的幸福负责的唯一的人。”在全学院毕业生悉数领到毕业证书后，主持人号召全体学生站起来，挥手向自己的家长，或任何在漫长、艰辛的求学生涯中给予他们支持的人致意。我站起身，微笑着伸出手，一阵暖意涌了上来。

母亲走之前问我会不会想念她，我不假思索地说：“不会。”母亲走后，我从机场回到家里，感觉浑身瘫软。一头栽进枕头里，满满全是母亲的味道，我一觉睡了十二个小时。记得曾有位小说家写过一本书——《爱与痛的边缘》，我不知道好不好，因为没有看过。但是我躺下的那一刻，就处在爱与痛之间……

（王传生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8月14日，刘程民图）



崔永元

齐含笑大我一岁。他父亲是军医，家里自然医书成架，这让他有了骄傲的资本。一个下午，太阳晒人，我们钻进他的小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他忽然发问：“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同？”我答得飞快：“女的头发长。”他仰天大笑。笑声没停，他就捧来一本医书，说：“你自己看吧。”天哪，我就这么被启蒙了。上高中后，我每天放学照例去找他玩。他的小名没变，还叫“三儿”。他母亲说：“三儿明年要考大学，以后你别来找他玩了。”逐客令一下，我一年看不到三儿的影。他上的丰台三中是一所普通的中学。听说他要考北大，有的老师哼着说：“也不拿镜子照照。”

考完以后一发榜，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东大街六号院的第一个大学生。喜讯传来，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母亲下了死命令，要我效仿三儿，考上大学。从那个假期开始，她也给三儿下了逐客令。母亲们发狠是不计代价的——你有儿子，我也有儿子；你儿子当班干部，我

儿子第一批入团；你儿子学小提琴，我儿子也要拉；你儿子上大学，我儿子也上大学；你儿子没生儿子，我儿子也生个女儿。拼到这儿，母亲们拼不动了。

上了北大的三儿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听不懂的话在他嘴里增多了，凡事都压人一头。一次，我说起《荷塘月色》，他不动声色地说：“那荷塘就在我宿舍前。”（编者注：此处为调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写于清华大学）我写了一首诗，他看也不看，随口吟出同学的新诗：“信手摘一朵勿忘我，又轻轻地把它揉破……”更气人的是，有一次，他家里聚了一群男女，他母亲指着他们，高声介绍说：“都是北大的。”

光阴少一寸

◎崔永元

我去找别的玩伴，他们层次实在低。一个伙伴投我所好，写了一首诗：“赤脚医生下乡来，替人看病除忧愁……”我说：“诗必须押韵。”他一下子就蒙了。我只好举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个‘闲’听上去是不是像‘难’？”那个伙伴恍然大悟，伏在案上，一袋烟的工夫，将诗改成“赤脚医生下乡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为了我们来，为了我们看病来”。我们只好改为酒肉朋友，再不以文会友。

我心里明白，这样下去，我和三儿他们“崛起的诗群”的距离会越来越来。

我开始对考大学产生兴趣。三儿家我不去了，引得他好奇心

大增，周末回家非要看看我在做什么。他的“狼子野心”被我母亲识破——他无非是想耽误我的时间。他被逐了出去。经历过“文革”的母亲叮嘱我：“对这样的人防着点儿。”母亲那一代人敬奉的信条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无所顾忌的年青的一代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

20年后，阴差阳错，三儿和我成了同事。屏幕上打出的名字“海啸”，就是当年的三儿。同在《实话实说》，他做策划，我来主持。许多观众喜爱的节目如《郭大姐救人》《噩梦醒来是早晨》《我的儿子太潇洒》，就是他领衔策划的。

有时，我得了便宜还卖乖，高声喊：“看啊，广院的管北大的，新闻系的管中文系的。”三儿不能把我怎么样，也告不倒我，没人诬告的日子真好。其实，早在1981年夏天，我就和他平起平坐了。那年，我已经接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三儿和我悠闲得找不着北，共同回忆起小学暗恋的女同学。我暗恋的那个，名没记住，姓也忘了，只剩下一个印象——漂



齐含笑

手拉手跑的幸福

◎沙叶新

防空警报声响彻成都民居的上空、街道的上空、田野的上空、河流的上空。警报声中，徐永鹄拉着张大千的手在奔跑，穿过大街和小巷。街上逐渐空无一人，张大千和徐永鹄已经躲进防空洞口。

张大千在洞口看大街上无人，便走了出来，还把徐永鹄拉了出来。

张大千：“别进去了。”

徐永鹄：“干吗？”

张大千：“从来没看过空荡荡的大街，没看过这么安静的大街，太舒坦了！”

徐永鹄：“轰炸，危险！”

张大千：“炸不到我！把我炸死了，我的绘画大业谁来完成呢？”

徐永鹄：“那我呢？”

张大千：“把你炸死，谁来陪我画呀？我们命大，因为还有一条命。”

徐永鹄：“什么命？”

张大千：“使命！我们再在大街上跑一圈。”

徐永鹄：“还跑？”

张大千：“好玩。好久没这样跑过，这样疯过了，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拉手，跑！”

警报声响彻成都上空，几乎所有的路上都已经空无一人。张



大千拉着徐永鹄的手跑过许多街巷。越跑越高兴，好像不是在防备空袭，而是在公园游乐。他们没有恐惧，只有幸福！

不到半年，警报声变作锣鼓声、鞭炮声，变作欢庆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画室里，徐永鹄给张大千在画案上铺开宣纸，并为之捧砚。

徐永鹄：“画什么？”

张大千：“荷花。”

徐永鹄：“为什么画荷花？”

张大千：“一是我最欢喜画荷花，二是荷花最欢喜被我画，三是荷花最能表现我现在的满腔欢喜。”张大千以浓笔泼墨，画了一幅《红荷图》。笔法舒张，荷叶卷如惊涛，莲梗挺拔，芙蓉怒放，满纸豪情。

张大千：“怎么样？”

徐永鹄：“好！”

张大千：“怎么个好？”

徐永鹄：“你把抗战胜利万民欢腾的气氛画出来了，你把自己喜极欲狂的心情画出来了，所以你画的荷花是喜的荷花，是笑的荷花。”

张大千：“好，你看懂了。你跟我学画一年多，没白学。”

（生如夏花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张大千》一书，张大千图）

亮。到底是大一岁，三儿把他暗恋的那个女孩记得特别清楚。一刻也没耽误，我们回到良乡，七拐八问，终于觅到那女孩的踪迹。上了一个高门台，三儿文质彬彬地刚一发问，一条恶狗便扑了出来。我俩掉头便跑，春心全无，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后来，那女孩出来，轻轻一唤，恶狗变了个样，轻摇尾巴，好像什

么事都没发生。进入家中，那女孩招呼我们坐下，手里没停，一直搓洗着盆里的衣服。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黑黑的农村女孩。三儿那天很亢奋，回去时一路讲着美的哲学意境。

前两天，我们一起开策划会。三儿坐在我对面。阳光一闪，我看见了他头上夹杂的白发。这样的朋友真是面镜子，我

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脑袋。三儿考我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同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弹指一挥间，白发上了两个人的头。有朋友相伴，日子过得飞快。工作中，三儿从不用我催，原因很简单，“一寸光阴一寸金”，三儿整整比我少一寸。

（余娟摘自华艺出版社《不过如此》一书）



互联网征信时代来了

●于靖园

“等这一天很久了，终于可以办签证了。”

2015年7月13日，上海白领周婷发了一条朋友圈消息，图上是一个绿色醒目的分数：766分。

这是支付宝客户端里芝麻信用服务所提供的分数，在分数的旁边，写着“信用极好”。很多人不知道，仅仅是这个数字，就可以让周婷轻松申请到申根签证。芝麻信用分在750分以上的用户可申请卢森堡签证。卢森堡是欧洲26个“申根”国家之一，持该国签证，可在包括芬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26个申根国家通行。

征信是信用体系的基础

选择服务商，进行芝麻信用验证，填写签证申请单等资料，在线支付签证费，就可以送签，等待电子签证出签。而用户的芝麻信用分高于700分就可申请新加坡签证，无须提供在职证明、个人信息表、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流程大大简化。

这个具有“神效”的芝麻信用分来自蚂蚁金服2015年年初推出的信用服务——芝麻信用，支付宝用户可以开通自

己的芝麻信用功能。芝麻信用分综合考虑了个人用户的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的信息。

未来，当用户的芝麻信用分达到一定数值，租车、住酒店时将有有望不交押金，网购时可以先试后买，办理签证时不用再办存款证明，等等。

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表明，65.9%的受访者对征信一知半解，而非常了解的只有1.7%。平时只有27.3%的人非常关注个人征信记录。

“征信，顾名思义，就是征集信用。”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韩家平说。对于征信，详细的解释，就是授信机构（金融机构、商家）自身或委托第三方征信机构对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验证，形成信用报告，应用于信用决策。征信的出发点是为了规避交易风险。

“对于老百姓来讲，征信主要意味着个人征信，去银行申请信用卡、办理车贷或房贷、求职、投保都与个人征信有直接关系。”韩家平表示，现在中国的经济形态，信用已经占了主导地位，现金交易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没有征信支撑的话，交易的风险就非常大。“征信是信用体系的基础。”韩家平说。

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时间为六个月。

这八家机构各具特色，分属四大类：一是互联网巨头，二是保险公司，三是老牌征信公司，四是拥有数据资源的新兴公司。其中，拉卡拉征信积累了十年银行跨行转账记录，中诚信征信已布局医疗、保险、学生创业，芝麻征信覆盖生活化应用场景，腾讯征信前期看





重金融场景，前海征信主打借贷业务。

互联网时代，信用即财富

“用快的打车、滴滴打车预订出租车，如果连续取消很多订单或出现违约记录，未来可能被计入个人征信记录中。”蚂蚁金服信用业务相关负责人说，“基于购物信息、支付习惯、黑名单信息等大数据，如果哪一天支付宝钱包给你的信用打了一个分数，请不要觉得奇怪。”

而对于腾讯公司而言，如果用户在朋友圈卖假货、利用微信诈骗等，这些信息未来也可能被计入个人征信记录中，尤其是盗取QQ号或微信号进行诈骗，或者微信公众号被举报等，都可能会影响个人的信用分。

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互联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支持大数据存储、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等技术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毫无疑问，互联网征信离我们越来越近。

继1999年上海开始个人征信试点的15年后，个人征信终于迎来了新时代。

伴随现代生活日益互联网化，单纯的信用卡使用情况、电信缴费情况，已不足以反映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尤其是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各种应用场景的产生都可能和个人的信用挂上钩，也可能因此催生更多的应用场景。

很多大学生是不能办信用卡的，但这些人可能很早就在网上购物了，进入大学时甚至已经成为资深支付宝用户了。尽管在银行端没有他们的信用记录，但他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足迹和行为数据，已经可以为其信用打分。

互联网时代，信用即财富。在当前的互联网服务中，有许多场景基于信用服务，比如免押金的租车服务和酒店服务，先试后买的后付款服务，签证的各种证明等服务。

“征信行业是很传统的行业，有几百年历史。这个行业最初就是委托调查的模式，到了互联网时代后，互联网跟征信结合，产生了互联网征信。”韩家平说道。对大数据的分析和信息自动化的采集，是互联网征信企业的最大特点。

在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调查里，有高达84.9%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征信能真实体现一个人

的信用水平。很多人，比如部分自由职业者、蓝领、个体工商户、学生等，没有信用记录，金融机构担心风险，不敢授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变得更加迫切。

大数据分析面临的相应挑战

其实，在征信领域发展相当成熟的美国，互联网与传统征信的结合也迫在眉睫。

“在美国，对于个人来说，信用等级通常等于FICO评分。由于美国三大信用局都使用FICO信用分，每一份信用报告上都附有FICO信用分，以至于FICO信用分成为信用分的代名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Moshe Adler说。影响FICO评分的主要因素是信用偿还历史，FICO评分的范围从300分到850分，得分越高则意味着违约风险越低。2014年有一半的美国人得分高于712分。

但是，2007年的次贷危机问题反映了信用评分是一个很差的违约预测系统。那些FICO评分高于700分的借款人，在2007年的违约率是2005年的4倍，几乎与2005年得到最差FICO分数的借款人违约率一样。

依靠信用评分进行评价真的比依靠客户表现来进行评价可靠吗？拥有更好的信用报告就意味着他是更好的员工吗？这依然有待考证。

由于传统的基于FICO评分的信用评估模型覆盖人群窄、信息维度单一、时间上滞后，所以，在大数据时代，无疑需要探索信用评估的新思路。

中国当前正在兴起的互联网征信企业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腾讯公司助理总法律顾问王小夏指出，互联网征信业务的雷区是敏感的个人信，而对个人信息的法律界定仍然有许多模糊的地方。

“独立性和真实客观性是互联网征信企业目前存在的两个问题。”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显示，40.4%的受访者认为，网络数据常常缺乏更深入的分析，这是大数据征信目前最大的缺陷。“大部分互联网征信企业既是数据的生产方，又是数据的应用方，是否能够保持中立，尚有待考证。”韩家平说，“比如阿里巴巴虽然掌握了很多的数据，但是它没有掌握在其平台之外的数据，因此这个数据是不完整的。”作为一家征信公司，应该有覆盖而很广的数据源，这样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信用报告。

（莞尔摘自《小康》2015年8月上，勾犇图）



东方意境

◎ [法] Thierry Bornier/图

Thierry Bornier 出生于法国，工商管理硕士，在纽约工作过7年，是一家国际时装公司的首席财务官。2006年他来到中国上海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云南的元阳梯田，被哈尼族人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所震撼。他回到上海后辞去原有的工作，拿起相机，去做一名职业摄影师。他长期居住在中国云南，把昆明当作自己

的家乡，他的步履几乎踏遍中国所有的美景。通过他拍摄的照片，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中国，也能够感受到他对中国的热爱。梯田是 Thierry Bornier 最常用相机表现的对象之一，在多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常常会因梯田的大量消失而感到惋惜，这让他有一种使命感——用自己的相机留住更多正在消失的中国美景。





● 童庆炳



我的“节日”

上课跟写文章是不相同的。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你必须始终用你的学识、逻辑、风趣、声音、手势乃至你的仪表、风度、恰当的笑和突然的严厉，抓住学生的心。而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讲的是一个重复了多遍的问题，对你自己来说已经毫不新鲜，可你必须兴致勃勃，似乎这个问题你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你的感觉必须与学生同步。你觉得某个问题很难，似乎不可言传，可你不能知难而退，必须在你觉得困难的问题上用力，把难题讲得清楚而又透彻，否则学生就会给你一个评价：我们懂的，老师也懂；我们不懂的，老师也不懂。某个问

题很枯燥，你必须调动你的一切积累，包括你的感情秘密，拿出来讲，把枯燥的问题化为有趣的故事……上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高级的艺术。

上课是人生的节日

我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了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

上课既然是节日，认真备课是无须说的。你可以讲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但每一个汉字你都必须读准，读错字是不允许的。因此连点名册上每个学生的姓名你也必须在开始上第一堂课前高声地先朗诵一遍。如果遇到一个字有两种读音，那么你必须事先了解这个字在这个名字中读什么音。至于大部分学生常读错的字，你在读到这个字时，还必须故意读重一些，让学生交头接耳，以为老师读错了字，然后你把这个字用拼音注出来，并说这个字常有人读错，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读音，又获得了学生的信任。这以后，你放心好了，学生们再不会交头接耳了。但这不重要。

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平添几分精神。平时你可以穿得随便一些，就是让学生看见你穿短裤，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当走上讲台时，你必须穿上你最好的服装。这是你的节日，此时不穿，何时再穿？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我仅有的名牌就是一条金利来领带，每次我都细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须擦亮，这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我的习惯，她总是在我上课前一天，把皮鞋擦亮，并放在我的书房门边，让我很方便穿上。但这也不重要。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这四十年中，我在各地上课，我的习惯是，手里拿着一支粉笔站着、走着讲课，绝不坐着。

你们就想象我上课时的样子吧：他站着，讲着，随意地做着各种手势。你瞧，此刻他为了说明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步伐变得如同艺术的舞步

一样，他竟在学生面前装成街上的游客，东张西望地先走了几步，然后又跳起了三步舞或四步舞；为了说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总是符合“对立的原理”，他学举重运动员，先蹲下，后举起，学跳高运动员，先用力向下一踏，再高高地飞身而起，越过了横杆。虽然舞步并不漂亮，动作也不规范，但这没关系，因为这舞步与动作，与所讲的观点十分吻合，引起了学生会心的笑声，他也颇为欣赏自己的表演。这样很累，在他下课回家时，立马瘫倒在沙发上，像一头生病的猪。但这也不重要。

与生活相通

知识义理总是与生活相通的。为了深入浅出，你不能老是念讲义，不能老是操经过修饰的“外部言语”。你得把讲稿扔开，运用你自己的生活体验，并操一种同朋友聊天时的未修饰过却充满激情的“内部言语”，让学生觉得你是一个会观察、会体验、会检讨自己生活的人。为了说明“特征”是什么，把你全家三口都“搭”进去了，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时，我四十多岁，住在校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上课、开会，还有行政工作，早出晚归，家务事都由多病的妻子操持。有时我回家很晚，常遭妻子埋怨。

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已近晚上十点，妻子、孩子等我回家吃饭，都等急了。这一次我的处境非常糟。妻子怒不可遏，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向我袭来。她说我在家什么也不干，是个白吃饭的——一骂就是半小时。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着头听着这空前的唠叨。我心想我也做了家务事，你怎么能这样一笔抹杀呢？但我不敢出一声。我对我的孩子出来为我辩护以收拾这难堪的局面也不抱希望，因为他总是站在他母亲的一边。

然而奇迹出现了。我的孩子突然向我走来，一下子夺下我还挂在肩膀上像粪兜一般的黄色书包，往地上用力一倒，然后指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冲他母亲吼叫起来：“你看，你说我爸是白吃饭的，什么也不干，是吗？看他书包里装着什么！”地上散开了我书包里的东西，这里有我正在读的夹满了纸条、画了许多红道的书本，有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小字的讲义本，有刚做的卡片，有学生的论文、作业，有给老家寄的汇款单存根，有粉笔头，有发干的白菜叶，有半干不干的切面条，有破碎的

干馄饨皮，馄饨皮上还粘着黏黏糊糊的肉末，它已经发臭了……看着地上的这些东西，我妻子哭了，我自己也流下了眼泪。那些不该在书包里出现的东西是我下班时为家里买的，我身上只有一个书包，我就让它们与书本、讲义、粉笔临时做了伴……我的一次生活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丰富而艰辛的生活，都浓缩在这个书包里。这书包就是“特征”。学生们为我的故事鼓掌，他们理解了“特征”的含义，似乎又受到感动。课后，有学生为此写诗赞美我。但这也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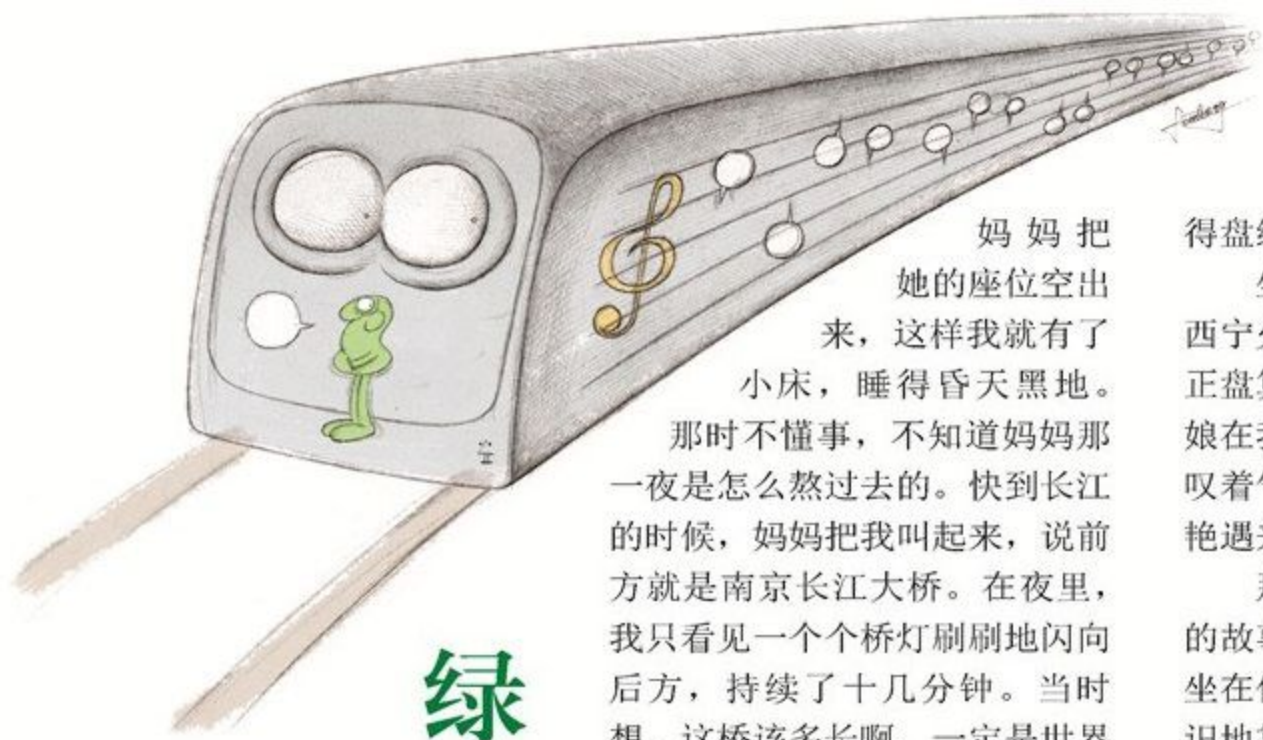
上课时的感觉最重要

你是老师，但你在学生面前绝不能摆老师的架子。你要允许学生在你讲课的过程中举手插话，提出疑问，或反对你的意见。我有一位学生，叫陶东风，他跟了我七年，从硕士生到博士生，如今已是文学博士和大学教授，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他从不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好话，但我们关系融洽。他就是总要在我的讲课时插话“反对”我的那一位。我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固执地举起手来，之后课堂气氛会变得特别好：有的同学同意他的意见，试图为他的理论进一步论证，有的同学不同意他的意见，激烈地为我的观点辩护，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把我这个老师暂时忘掉了。到头来他们往往“两败俱伤”，主动说“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说吧”，多数情况下总是我的意见占上风。但最有意义的是，我讲的一个观点经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我自己，这就叫“教学相长”吧。但这也不重要。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上课时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还一无所获，我感到很失望。可突然运气来了，我终于抓住了一条不算大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鳊鱼，我那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鳊鱼的感觉。

（林冬冬摘自《大学生》2015年第16期，戴晓明图）



绿皮火车

◎周云蓬

我家住在铁西区，这里是沈阳的工业中心，“铁西”名字的由来是有座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我总要踮起脚向桥上看，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那种力量和速度，以及它要去的远方，令一个孩子兴奋而恐惧。

后来，我患上青光眼，妈妈带我去南方看病，那时从沈阳到上海需要两天一夜，感觉真是出远门。走之前，很多邻居都会到我家来，让妈妈帮忙带上海的时髦衣服、泡泡糖、奶油饼干……很多小朋友甚至羡慕我说，他们也想有眼病，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

在火车上，孩子的兴奋就那么一会儿，接下来是疲惫困倦。

妈妈把她的座位空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小床，睡得昏天黑地。

那时不懂事，不知道妈妈那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快到长江的时候，妈妈把我叫起来，说前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在夜里，我只看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持续了十几分钟。当时想，这桥该多长啊，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就像当时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二

我16岁时，是个失明7年的盲人，确切地说，我是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我可以拄着棍子满大街走，能躲汽车过马路，能进商店买东西。

一天，我告诉妈妈要去同学家住几天，然后偷偷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因为是过路车，没座位。我坐在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抵达的大城市。我终于一个人面对世界了。

三

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被煮得久了，人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

2001年，我被煮得快窒息了，就去了火车售票处，我问了许多地方，都没票了，问到银川的时候得知有票，就买了一张。我在银川的光明广场上卖唱，赚

得盘缠，继续向西。

坐火车来到西宁。半夜了，西宁火车站候车室空空荡荡，我正盘算着下一步去哪里，一个姑娘在我旁边坐下，很有方向性地叹着气，我窃喜：莫非传说中的艳遇来了？

那时，火车上总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长途列车上，某姑娘坐在你旁边，她困极了，就下意识地靠在你肩膀上睡着了。你虽然也困，但为了让陌生的姑娘能睡好，一天一夜保持坐姿纹丝不动。等姑娘醒了，会马上决定嫁给你。

回到我的现实里，我问她是否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吗，她说她在西宁打工，老板拖欠工资，现在身无分文，要回家。我连忙拿出卖唱时别人塞到我包里的饼干、面包，与她分享。

我们在哈尔盖下了车。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两杯青稞酒壮胆，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说，她有男友了，在兰州上大学。她说，既然都把话说明了，两人再一起走就太尴尬了。她说想回兰州。

哈尔盖只有去两个方向的火车，她去兰州，那我就只好去格尔木了。去格尔木，那是通往西藏的路，车厢里，有更多的人在念经。闻着酥油茶的味道，听着陌生的站名，晚上车厢里很冷，外面是茫茫的盐湖，我感到透骨的孤单。到格尔木，中国的铁路就到头了。

（志鹏摘自九州出版社《绿皮火车》一书，刘宏图）



有一次长途旅行，我坐的是卧铺。旅途漫漫，除了看书、听歌，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看人。

一列火车上有很多人，每个人都带着疲惫的神情，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聊得投机的话，或许一刻钟之内就知道了对方的秘密；也可能只是沉默，或许你到了自己下车的那一站，还对周围的人一无所知。

了解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认真去观察过一些东西。

故事发生了很久，有三年多了，今日才突然想起来，是因为最近很多事情使我感触颇多，面对种种无言，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

我对面的下铺，是一个妇人，30岁出头，穿了一套运动装，躺在卧铺上一动不动。

刚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渐渐发现，她每隔十几秒，身体就会不自觉地抽搐，然后她就顺势做着掩饰尴尬的动作，比如手突然抽了一下，她会顺势用手背擦擦汗。

渐渐所有的人都发现了这一事实，而她依然在努力克制自己的不自觉抽搐，同时努力去掩盖自身的缺陷。周围的人虽然不再看她，但心里一定在想：她究竟是怎么了？猎奇心理愈发严重。

列车在夕阳中驶入隧道，进入夜晚。对面的妇人早早入睡，但仍止不住身体的痉挛。更为严重的是，她躺下之后的抽搐使得气管也发出尖厉的声音。

那个晚上我在半梦半醒中度过。

第二天一早，我见对面的妇人已经醒来，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这时从车厢另一头走过来一个推销员，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本来觉得无所谓，但我突然想到，如果推

销员向对面的妇人推销的话会怎样。

似乎人人都有这种感觉，气氛也变得紧张。

一抬头，推销员果然坐到了妇人对面，我也开始紧张起来。

紧张的原因不是怕妇人把推销员吓到，而是怕她克制不住自己的抽搐，而伤了自尊。从她不停的掩饰里，我看得出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3秒，5秒，8秒，10秒……推销员一句一句地说，我担心她不能控制住自己，心里也在盼着时间快点过去。

15秒过去了，30秒、60秒过去了，我第一次发觉时间过得这样慢。

妇人一言不发。推销员觉得无趣，起身走向另一节车厢。

推销员刚走开5米，妇人又开始控制不住地抽搐，她的手依然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继续擦拭没有汗的脸……

这段记忆被我写在了某本小说里，每次扛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想一遍这个故事。那天，在她扛过推销员推销的两分钟后，我哭了，拿出一本小说，遮住了自己的脸。也不知道为何，就觉得自尊伟大，其实更应该说是人性的胜利。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双眼睛看着她，也不知道多少人和我有类似的想法。

至今，我仍很爱乘火车，在卧铺上，靠在枕头上看书，或听着铁轨的声音，沉沉睡去。

如果我爱上谁，我们一定要乘火车去很远的地方，一路都是风景，包括思考时呈现的风景。❁

（李林俞摘自中信出版社《谁的青春不迷茫》一书，杜凤宝图）

不发言，扛过去

◎刘 同





舅舅家所在的村庄2014年有3位老人自杀，原因都是疾病缠身，不肯拖累儿女，因此选择自我了断。

舅舅家与我家同在一个镇上，相距3公里左右。按照习俗，每年大年初二，我都要去舅舅家拜年，因此村子里的许多老人我都见过。

突然想起2013年夏天回乡，正是插秧的时节。我回到村庄，村邻议论的热点不只是上涨的化肥、农药价格和人工费，还有两位老人的相继自杀。

香婆的家在旧小学旁，是拆了原来的队屋建起来的两层小楼。老伴去世后，香婆空巢独居在家多年，儿孙常年在贵州经营煤气生意，还开起了自己的煤气站，生意越做越大，无暇顾及香婆。

香婆早年患上青光眼，2012

年到医院做了手术，但依然视物模糊。不料祸不单行，香婆于同年中风后半身不遂，从此大多数时候卧病在床，饮食起居需要邻里照看。

春节期间，香婆刚刚享受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孙子的婚礼在大年初八举行，婚礼隆重而热烈，村邻对香婆孙子婚礼的描述中透着羡慕。

村里人对香婆自杀原因比较一致的描述是：香婆中风后，儿子委托村里另一位老太太照顾香婆起居，但这位老太太的儿子不同意年约七旬的母亲照顾香婆。香婆听到消息后一时想不开，就喝农药自杀了。

也许是孙子婚礼期间的热闹，让香婆在随后的3个月里更觉冷清，最终选择了自我解脱。

村邻对香婆自杀的具体日期记忆模糊，只记得几天后七旬的木叔也自杀了。

木叔有两个儿子，儿孙常年

在外打工。前些年，大儿子到邻镇建了房，搬离了村庄。木叔还留在村里，住在小儿子家里。几年前，木叔的老伴上吊自杀，给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大多数时候，木叔一个人在家。

木叔的小儿子这些年一直在哈尔滨做泥工，每天有约300元收入。当年春节后，木叔的小儿子急着与同伴外出，并买好车票，但在这节骨眼上，木叔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送到市人民医院，检查出木叔患有心脏病和肺病，各个器官都有老化衰退症状，这样的病不好治。

随后的日子就是两代人的枯守，木叔病病歪歪地躺着，小儿子心急如焚地回应着远在哈尔滨工地的同伴的召唤。最终，木叔的焦虑决定了事情的走向，木叔上吊自杀，步了老伴的后尘。

木叔的族人对木叔的选择充满感伤，称木叔担心拖累儿孙，又忍受不了病痛折磨，所以开了

大国空村

◎程明盛





“快车”。



据有关报道，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1/3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农村。

接连发生的老人自杀事件，牵出村庄空巢家庭的养老困境。

程湾村现有40多个留守家庭，绝大多数是空巢家庭，其中21个家庭只有老人留守，更有5个家庭只有1个老人枯守，沦为独居老人。对于独居老人而言，白天还可以找人闲聊化解寂寞，当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冷清的家如同炼狱，孤独、寂寞、无助、焦虑之下，如果再遭遇病痛的折磨，老人就容易走上极端的自我了断之路，留给家人无法释怀的愧疚。

与村中留守老人闲聊，他们大多故土难离，不愿意到儿女谋生的地方给儿女增加负担，也不习惯异地他乡语言不通的环境。但在缺少年轻人的村庄里，老人成为容易受伤的群体。

去舅舅家探望，屋里没人，向邻居一位七旬老太太打听。这位老太太以前我见过，但那天她显然没有认出我，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没有作声。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开，恰好亲戚闻讯走来，热情招呼我。邻居老太太见了，面露喜色，立即报出了我母亲的名字，不好意思地向我表示歉意：“怕遇到骗子，以前就有人来骗钱。”

与村主任说起老人，他说起

2012年的一场骗局。从邻县过来一伙人，共有5个人，开着一辆面包车，一路骗过来。到了村里首先找干部，他们有村干部的电话，还出示了工商营业执照，然后挨家挨户分发一张商业联盟卡，每家收30块钱，说是在全国各地都能用，在镇上商行买东西也能便宜，4块钱的东西凭卡只要2块钱。村干部感觉不对劲，向警方报了案，但村里已有6家被骗了。后来，这伙人在邻村行骗，被抓时已经骗了3天，受骗者达到200多人。以前，程湾村还有一位老人被骗走400块钱，骗子是在村里做工的人，称要换钱给亲戚家送礼，用假钞换走了真钞。

那天在邻居香伯母家闲聊，她的5个儿子都在外做小生意，她和老伴留守。说起村里的事，她说，年年冬月都有好吃懒做的人偷鸡，贼人有时撬开门进来，有时揭了瓦翻进来，有时打个墙洞进来，有时将门上锁链剪断。他们晚上进了屋，用袋子封住鸡笼口，用手电对着鸡一直照，鸡就不动也不叫了，然后他们就把鸡赶进袋子里偷走。这些人平时不偷，专拣冬月间偷，因为平时偷了卖不出去，还要喂食。

村庄里，不少家庭有条件带老人一起生活，但一些老人自己选择留守。这些老人选择留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与儿女不相融合。



程湾村与中心集镇只有1公里多的路程，村口建有全镇唯一的液化气站。在燃气灶具早已普及的当下，想象中村庄炊烟缭绕的景象应该已经不存在了。

意想不到的，行走在村庄内，许多家庭前场后院堆满麦草和油菜秸秆，有的家庭门口廊檐下堆满柴火。

走进村民家中的厨房，我惊讶地发现，多数老人在使用一种三脚架支撑的钢灶，以木材为燃料。炒菜、做饭时，炊烟和油烟混杂着弥漫在厨房内，向窗口和门口方向飘散。留心观察，钢灶下积了厚厚一层灰尘，钢灶上方的墙面被熏得油黑发亮。传统土灶也没闲着，这种土灶有烟囱直通屋外，千百年来制造着炊烟缭绕的乡村景观。如今，村庄里留守人口太少，老人做饭往往因陋就简，主要采用钢灶。城市家庭必备的燃气灶，在许多家庭也有配备，但往往被老人闲置。

年迈的老人说起钢灶和土灶，往往不忘感叹一句：“烧出的饭真香！”他们埋在心里的另一句话是：“柴草不用钱！”

村庄炊烟缭绕的背后，是野蛮生长的杂草、树木。疯长的杂草、树木，给村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燃料，年迈的村民足不出村，便可以就近取材，顺便疏通村庄通道，一举两得。村民收割稻谷留下的部分稻草，收割小麦留下的部分麦草，收割菜籽和棉花留下的部分秸秆，也被保存下来，不再在田间地头付之一炬，白白浪费。

当许多人为昔日炊烟缭绕的乡村生活不再而惋惜时，程湾村留守老人以最后的炊烟，留住了久远的乡村记忆，也留给我们一段文明的感伤。

（真真摘自暨南大学出版社《大国空村》一书，王青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我的偶像李普曼

●吴晓波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3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时，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300多年来，那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到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想法。我在想，这条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位诺贝尔奖得主、7位美国总统，他们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都不过30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着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18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间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田中。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4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6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样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一本书。我还幻想像李普曼那样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缥缈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变得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时会坐立不安。这个才华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成中文的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清楚地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到熟悉，渐渐地越来越刺耳。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生无法忘记。



对比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的校训 ●龙应台

如果我是在“自由”和“真理”而不是“礼义廉耻”的校训下被培养出来的人，那会是什么样的呢？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弟弟是台大的博士，台大的校训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哥哥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东吴大学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弟弟所上的中学是台南一中，台南一中的校训是：“止于至善。”

和西方的主要价值观对比时，儒家的“道德”特质就更显鲜明。我是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毕业

生，堪大的校训是：“谨守大自然的法则。”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真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自由。”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自由之风飘荡。”美国西北大学的校训是：“凡事求真。”柏林自由大学的校训是：“真理，正义，自由。”

在这些著名的欧美大学的校训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强调“真理”“自由”，和强调“厚德载物”“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晓 东摘）

我常常会很认真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对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演变形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或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

我倒是做过一件与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05年，我在一次版权交易中偶尔得悉，我当年在大学时读过的那本《李普曼传》，并没有得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授权，是一本盗版书。于是，我设法找到了翻译者，竟又得知斯蒂尔还活着，隐居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我通过

电子邮件联系上他，斯蒂尔对当年的盗版行为非常恼怒，得知我想得到授权，先是表示不信任，后又委派华人朋友到上海面谈确认。经历3年时间，到2008年11月，我终于购得中文版权，并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传》。此事几经周折，结局却得偿所愿——我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向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会让人在某些时刻产生坚定信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20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六月的雨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一书）



最远的距离

● 李筱懿



《箫声》（徐悲鸿绘）

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的医院里，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即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过面的蒋棠珍，居然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13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她并不了解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

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面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刻着‘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然后是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这个名字与石头一起被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他们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身穿旗袍，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可以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婉转，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时，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

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用在艺术上。她不满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加深。

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予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作“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立马横刀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的用来装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

公费留学的机会泡汤。

徐悲鸿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

徐悲鸿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18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的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

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与她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多慈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的。”

在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

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100万元、古画40幅、他本人的作品100幅，此外，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的抚养费。

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地作画以满足她过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20万元已花完，要再给100万元和

100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

而月薪不过两万元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

28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

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

而经年打磨，她到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她不曾用过其他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离婚时“徐先生”给她的画换钱为生的。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

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

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假如没有张道藩。

与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

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藩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纪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以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刚刚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才有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笔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



《琴课》（徐悲鸿绘）



完美青春 ●陈丹燕

这是一间传统精英女子高中的楼梯厅，两侧的楼梯扶手上有很大的哥特体烫金字，一边写着“UP”（上），另一边写着“DOWN”（下）。在课间学生转换教室的几分钟里，穿深棕色羊毛背心和短裙的少女们抱着讲义，鱼贯地从这里经过。此刻这里一片安静，柔和的朗读声从长走廊里依稀传了过来。

这里保留着女中特殊的气味。空气中的微甜来自女孩子新鲜的身体和口腔，微酸则来自她们汗潮的脊背和腋窝，微臭一定来自她们的白色棉布短袜

和球鞋深处——女中的女孩子常常放肆地保留她们的体味，也许是因为她们不必在男孩子面前伪装淑女。那些新鲜的、容易出汗也容易变得通红的身体，散发着植物般不知掩饰的自然气味。到了成年，这气味就会变得清淡了。

还有一些幻想的气氛，来自青春汹涌而至的心灵。一些阴郁的念头、一些羞涩的念头、一些狂乱的念头、一些不能阻挡的恐惧和欣喜，像热汤上的白雾一样，浮动在女孩子留下的气味之中，就像墙上女生们自己画的小幅油画，那苍白的脸是因为心中有太多的激情。严厉而保守的灰墙，就像社会精英的传统对青春的压迫。

当我已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青春时，才发现被抑制的青春其实最浪漫。如果这里没有哥特体的金字，这里被喷满了墙画和青少年最喜欢的无厘头词语，浪漫的程度会大为降低。顺着金字鱼贯而行的女孩子们，像深夜里醒着的小兽，眼睛在铁灰色的背景下亮闪闪的。她们的身体跟随金字温顺地上下，但她们的青春却像地火一样四处蔓延。如今我才明白，这样才算得上是完美的青春。 ❀

（雷觉天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旅行方式》一书，苑明琨图）

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烦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

张道藩趁蒋碧微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蒋碧微当即退还，说：“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

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各自离婚后在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两人深度纠缠30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张道藩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视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遗。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30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梦。

蒋碧微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了50万字的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

两岸相隔，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20年，寂然离世。

就像一个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

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

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在进退之间。 ❀

（清荷夕梦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一书）



剪网

● 丰子恺

大娘舅白相（方言，可理解为“逛”“游玩”）了大世界回来，把两包良乡栗子在桌子上一放，躺在藤椅子里，脸上现出欢乐的疲倦，摇摇头说：

“上海地方白相真开心！京戏、新戏、影戏、大鼓、说书、变戏法，什么都有；吃茶、吃酒、吃菜、吃点心，由你自选；还有电梯、飞船、跑冰场，以及老虎、狮子、孔雀、大蛇……真是无奇不有！唉，白相真开心，但是一想起铜钱就不开心。上海地方用铜钱真容易！倘然白相不要铜钱，哈哈哈哈哈……”

我也陪他哈哈哈哈哈……

大娘舅的话真的道理！“白相真开心，但是一想起铜钱就不开心”，这种情形我也常常经历。我每逢坐船、乘车、购物，不想起钱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对于制造者工人与提供者商人很感谢。但是一想起要以钱作为一种交换条件，就减杀了一大半的趣味。教书也是如此：同一班青年或儿童一起研究，为一班青年或儿童讲一点学问，何等有意义，何等欢喜！但是听到命令式的上课铃与下课铃，要做到军队式的“点名”，想到商买式的“薪水”，心情就不快起来，对于“上课”的事就厌恶起来。这与大娘舅白相大世界的情形完全相同。所以我佩服大娘舅，觉得他的话有道理。

原来“价钱”这种东西，容易使人被限制，又减小事物的意义。譬如，大娘舅说：“共和厅里的一壶茶要两角钱，看一看狮子要二十个铜板。”规定了事物的代价，这事物的意义就被限制，似乎吃共和厅里的一壶茶等于吃两只角子，看狮子不外乎是看二十个铜板了。然而实际上共和厅里的茶对于饮者的我，与狮子对于看者的我，绝不止这样简单。所以倘用估价钱的眼光来看事物，所见的世间就只有钱这种东西，而无别的意义，于是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被减小了。价钱，就是使事物与钱发生关系。世间其他一切的关系，都足以妨碍事物本身存在的真意义。故我们倘要认识事物本身存在的真意义，就非撤去其对于世间的一切关系不可。

大娘舅一定能够常常不想起铜钱而白相大世



界，所以能这样开心地赞美。然而他只是撤去“价钱”这一种关系而已。倘能常常不想起世间一切的关系而在这世界上做人，其一生一定更多欣慰。对于世间的麦浪，不要想到是做面包的原料；对于盘中的橘子，不要想到是解渴的水果；对于路上的乞丐，不要想到是讨钱的穷人；对于眼前的风景，不要想到是某镇某村的郊野。倘能有这种看法，人在世间就像大娘舅白相大世界一样，能常常开心了。

我仿佛看见这世间有一个极大、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中。所以当我想把握某一种事物的时候，总要牵动无数根线，带出无数别的事物来，使得本物不能独立而明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因而永远不能看见世界的真相。大娘舅在大世界里，只将其与钱相连接的一根线剪断，已能得到满足而归。所以我想找一把快剪刀，把这个网剪破，然后来认识这世界的真相。

（晓东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静观人生》一书，丰子恺图）

贼多

我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颜值很高的男生老往我这边看。几分钟后他站起身，在他朝我走来的七八秒钟时间里，我迅速脑补了各种他有可能跟我搭讪的话，并迅速想出各种应对的语句，结果他对我说：“小姐，你可以往旁边挪一挪吗？我看不到我的电动车了，这时候贼多……”

不讲价

“阿姨，您皮肤真好，用什么化妆品呀？”

“大宝。”

“您身材真好，练过跳舞吧！”

“你别再说了，当你说完‘阿姨’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这土豆呀，少一分也不卖！”

害怕

我和老婆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时她对我说：“我有点害怕。”我问：“是剧情太吓人了吗？”她犹豫地说：“那倒不是，你别记笔记了，成吗……”

黑车

一个姑娘上了一辆黑车，司机说：“现在抓得严，万一被查到，你要说我们是朋友。”姑娘回答：“没事，就说我是你媳妇。”不巧开到半路，车果然被查。司机说：“这是我媳妇。”突然，姑娘说：“老公，我就在这下车，你给我两百元钱，我到前面超市买些东西然后自己回家。”司机无奈地掏出两百元，



哭着说：“老婆，早点回家……”

月薪十万

某天，我和仨哥们儿一起喝酒。喝高了，大家开始聊人生、谈理想。我说：“我的理想是和我爸一样月薪十万！”当时，他们都惊呆了，说：“没看出来你也是富二代啊！”我端起酒杯，慢慢地说：“不是啊，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十万……”

跑题

我带儿子去同事家做客。见同事女儿的作业上字迹工整，我对儿子说：“字迹工整的结果就是姐姐成绩很好，每次都考全班前三。”儿子赶紧打岔：“字迹潦草的结果就是我的成绩一般，每次考完试妈妈都会被老师接见。所以老师常见妈妈，都不觉得妈妈变胖了。”

情人节的玫瑰

一个哥们儿知道情人节玫瑰肯定涨价，便提前好几天把玫瑰买好，放在冰箱里。

终于到了情人节那天，他把玫瑰送给女友，并问女友玫瑰花怎么样，女友满脸疑惑地说：

“玫瑰虽好，但我怎么闻都是一股饺子馅味儿……”

抹零

吃完饭结账，102元钱。和老板商量：“抹个零行不行？”老板说：“行。”于是我拿出12元钱给老板，老板看了12元钱半天，说：“开了好几年店，就没听过还有从中间抹零的！”

住院

和一位交警同住一间病房，没事闲聊，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交警最不愿意拦的就是女司机。”

我：“为啥？”

交警：“一拦她们就紧张，一紧张就不知道踩刹车还是油门了。”

我：“你咋知道？”

交警：“我都住院了，还想咋知道！”

涨价

顾客：“大叔，素包子多少钱一个？”

大叔：“两块五一个。”

顾客：“怎么又涨价了？”

大叔：“猪肉涨价了。”

顾客：“可我买的是素包子啊！”

大叔：“可是我得吃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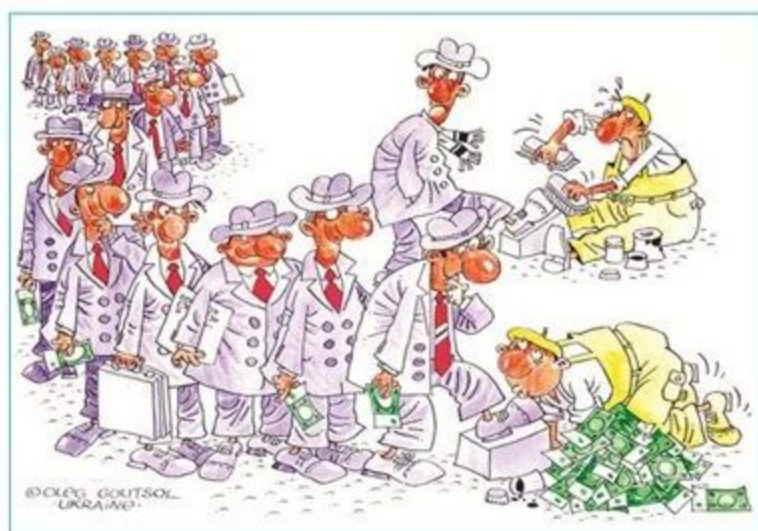
啤酒浇花

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道：“现在的报纸上净胡说。”我问：“说啥了？”老爸说：“说喝剩的啤酒能浇花。”我说：“有什么不对吗？”老爸嘿嘿一笑，道：“酒还能有剩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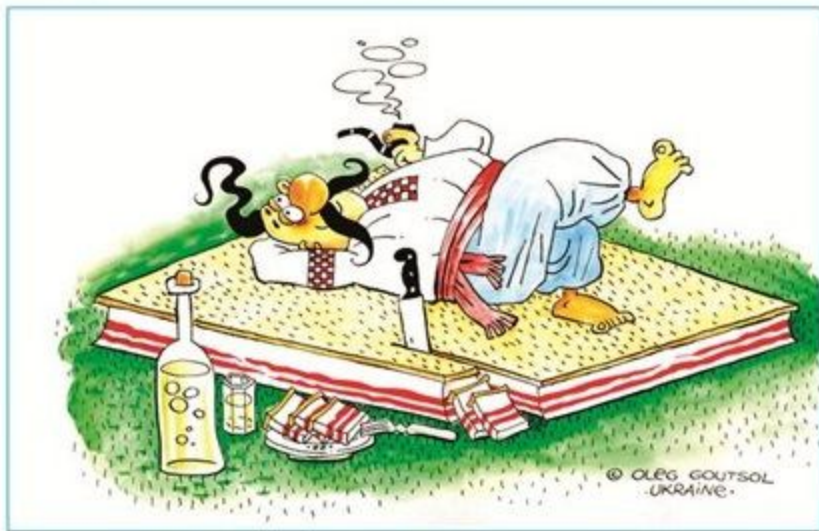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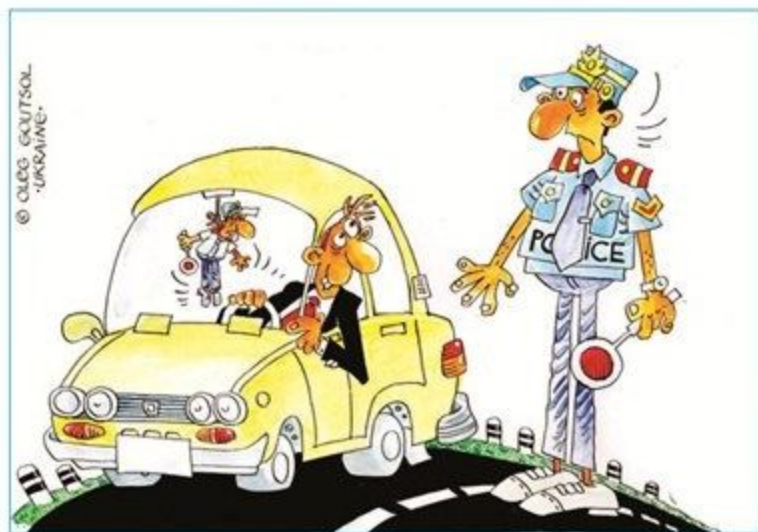
（夏天、浩伟、聃尘等摘）



● [乌克兰] Oleg Goutsol



乌克兰漫画作品欣赏





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武器

●张明扬

与对官僚苛刻而著称的朱元璋相比，希特勒是一个再慷慨不过的帝国领袖了。

读《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我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杜月笙的影子：一位不治私财，不敲诈下属，反而无微不至地满足下属经济需求的“良心黑老大”。

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

在如何巩固党政军高层对他的忠心这个问题上，希特勒表现得特别朴实，一点都不整虚的。他依靠自己名下的小金库建立了广泛的私人“慈善圈”，用远高于国家正规工资的水平向他的亲信们发放各种馈赠和资助。

据说德军的高级将领起初对这位一战时的下士持鄙夷态度，而希特勒的回应则是以德报怨——砸钱改变他们的看法，他对陆军元帅人均赠送24万帝国马克。著名的凯特尔元帅收到过希特勒76.4万马克的礼金，古德里安大将更是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对于希特勒与军队此种“钱浓于水”的联系，一位仇视希特勒的德国反对派只能哀叹：“（希特勒）用一根黄金的、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希特勒的钱袋子对党政精英也同样敞开。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一下子就收到了元首100万马克的礼金。应该说，整个党政高层都感受到了元首的出手阔绰，生日礼金向来是10万马克起价的。当希特勒得知柏林警察总长参与了

1944年的政变阴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认为此人背叛国家、背叛党之类的，而是愤怒地指出他曾多么慷慨地资助过这位叛徒。

更令人感慨的是，希特勒对那些失势的前纳粹高官也全无世俗的凉薄，甚至那些被希特勒亲自搞下台的，也能得到一大笔补偿金或者干脆是一套别墅。

希特勒就是第三帝国这场腐败贿赂大戏的总策划。必须予以澄清的是，希特勒的腐败资金大多并不是贪污公款而来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德国工商界给“希特勒基金会”的募款。最特殊的是两笔钱：一笔是纳粹追随者去世前留给希特勒的遗产（指定元首为继承人），一笔是《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可以说，希特勒已经达到了“公私不分”的“无我境界”，为了收买帝国精英们，他竟然连私房钱都贡献了出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希特勒的带动之下，纳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此种腐败风潮。各路高官都建立了各自的私人基金，用以资助亲信，或者资助艺术家和科学家。《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展现了希姆莱的庞大“慈善帝国”，他帮党卫军干部们支付度假费用，甚至还做帮他们还债这么私人的事情，泛滥到连那些中低层的下属都“不放过”。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

收买；除了利用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

“老同志”的腐败福利

足以让纳粹全党感到振奋的是，纳粹式的腐败绝非高层的特权垄断，也制度化地“普惠”到了全党上下。希特勒与纳粹高层对“老同志们”有一种慈父式的怀旧之情。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纳粹二号人物赫斯就发表讲话称：“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完备。”

在就业上，纳粹老党员们获得了超国民待遇，用赫斯的话来说就是，“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纳粹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老同志为名义，将几十万纳粹党员安排到了国内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上，仅帝国邮局一家，在几年间就接纳了3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当然，这些国家单位是不需要这么多岗位的，“老同志们”快乐地在其中“工作”。在私人企业中，资本家们也被迫雇用“老同志们”，纳粹甚至在招投标时，将雇用“老同志们”作为竞标成功的一项潜规则。更夸张的是，身为纳粹党员，在招投标中也能获得党和国家的特殊照顾，经常上演高价招标成功的奇迹。据说纳粹有明文规定：“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



就要感谢国社党。”

全民的腐败狂欢

为什么德国民众可以容忍政治高层腐败，甚至纳粹的全党腐败？《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中很直白地指出：“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

事实上，该书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对德国所谓的全民腐败有些语焉不详，其中的细节可以参见《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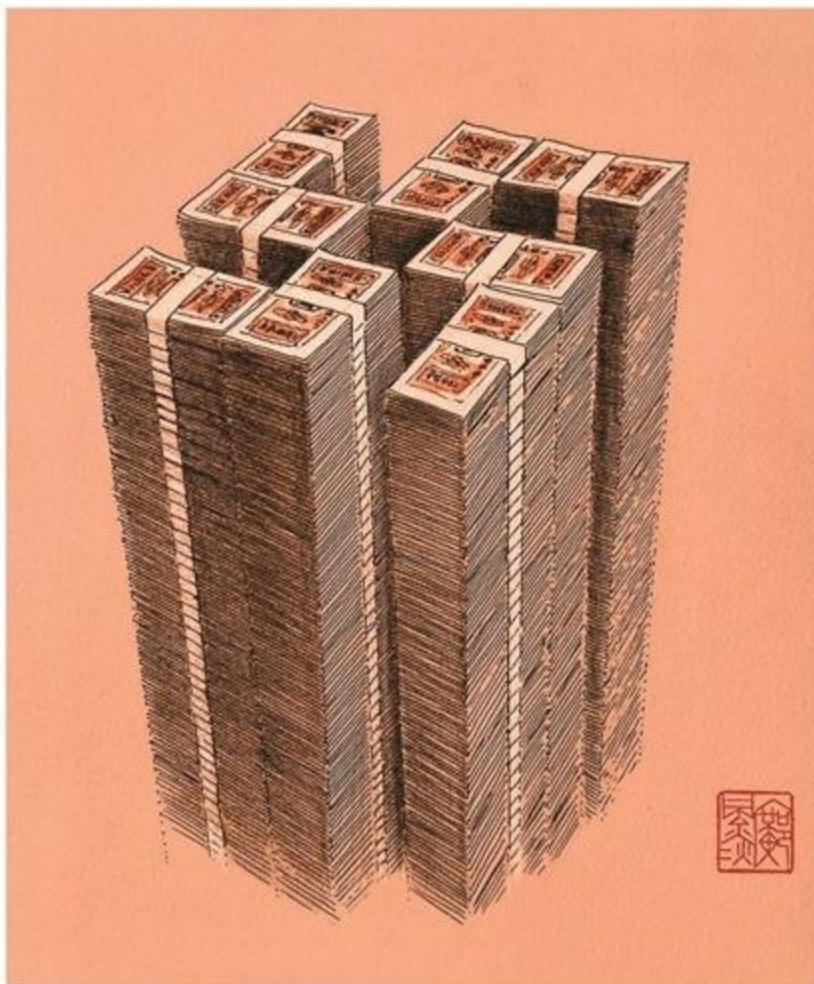
一个关键的逻辑在于，如果全民都参与腐败，并且能广泛地获得好处，那么，谁来提供

其中所需的巨大资源？《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出的答案是：希特勒是以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贿赂”普通德国人的。或者说，就是通过掠夺被侵略国家的经济资源，来提供德国国内全民腐败的物质基础。

一战给普通士兵希特勒留下的最大梦魇就是前线物资的极度匮乏，以及国内的大饥荒与通货膨胀。以史为鉴，希特勒在二战

中简直是近乎偏执地与经济专家对着干，对德国民众始终坚持“永不加税”的“仁政”。希特勒相信，只有不降低战时德国国内生活水平，才能获得德国民众的长期支持，才能避免一战末期后院起火的惨剧再度上演。

不得不说，希特勒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无怪乎，《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希特勒的统治冠以“受欢迎的独裁”的高度评



价，“他们日复一日地收买了人们公开的赞誉，或至少是漠不关心”，“不断地运用社会政策进行贿赂，构成了希特勒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统一的基础”。

为了让国内民众满意，又要负担这场历史上最昂贵的战争，第三帝国政府只有强征不断提高的占领军税，摧毁了欧洲的货币体系；为了保证本国的食品充足，纳粹在占领国抢掠了数百万

吨的食物，供应给德军官兵，之后还大量运回德国。

纳粹高层明确地制定过一条原则：“如果在这场战争中有人挨饿，那么一定是别人。”为了供养德国人，纳粹甚至加速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而理由仅仅是为了省下口粮。

即使在前线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普通德国人也能吃饱喝足，然后继续支持希特勒政权。希特勒对此再清楚不过了，纳粹的“千年帝国”理想，无论听起来如何花团锦簇，饿上三天就会完全不同了。

对于德国民众在战争期间的饱暖程度，德国妇女们最有发言权。据说，她们在1945年之后的十年中，还充满怀念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起来。”当然，德国妇女们选择性遗忘了一些事情：在德国战俘营中，每天有无数的苏联战俘被饿死；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饥肠辘辘，却还要将粮食优先

运往德国。

同贿赂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党员同志们一样，这一次，希特勒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德国民众则随波逐流，为小恩小惠欢喜不已，贡献了希特勒最需要的被动忠诚。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希特勒的最大政治武器是腐败。

（留痕摘自腾讯《大家》，微信号 ipress，邝颢图）

从天而落的母亲

● 韩浩月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时，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小时候不懂大人的世界什么样，等自己成了大人，那些小小的问题，还需要再问吗？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次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一直盯着那片池塘里绿色的水纹，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停止，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我以为自己是恨过她的，但根本就没有。对别人都不会有，何况对她。在我那奇怪的童年，脑海里被混沌与奇思异想充斥着，没有恨意成长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爱，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活得像棵植物。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10多年的时间，她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我父亲、母亲，我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我就会淡淡地说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我盼望母亲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她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我脑海里重复

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我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我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锃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慢慢地，我明白了母亲并不是一点儿也没关注过我。每年我去她住的那个村庄给我父亲上坟的时候，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在某一个角落里看我一眼。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或者，就算知道，也装作不知道。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我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话语权的我，开始做一些关于自己的决定：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母亲像个慌里慌张的孩子。她包着头巾，衣着俭朴，略显苍老。我喉咙干涩地喊了声许久没喊过的“娘”，妻子则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了声“妈”。母亲显得紧张又扭捏，想答应，但最终那声“哎”没能完整地说出来。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随便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我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她仿佛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妻子跟我说：“有你妈在真好，别让她走了。”我说：“好。”但在母亲面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25岁那年，我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她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为她养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那段日子很苦，母亲跟着我们在暂住的村子里搬来搬去，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母亲教育孩子还是用农村的那套老办法，把她不到一岁的孙子宠得不像话。我常奚落她：“别把我儿子宠坏了！”

“小男孩哪有不调皮的？越调皮越聪明。”母亲总是坚持己见。

儿子学会了叫爸爸、拍手、再见、飞吻等活儿，自然叫得最熟练、最亲切的是“奶奶”。每到此时，她都异常高兴，从来没见过她这么开心过。她有很多民谣，如：“宝宝要睡觉喽，奶奶要筛稻喽。”几乎每一首都和奶奶有关。

有一次妻子略带讽刺地跟我说：“瞧你，在你妈面前还撒娇呢。”“有吗？”“有。”“不可能。”“真的有，别不承认。”我仔细回想了以后，还是不承认有。也许只是觉得生活有趣，显得过于乐观了一点而已。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們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

母亲坐上出租车，脸上恢复了那种严肃的表情。她不看我，话也不多，无非是说少和媳妇吵架，少喝酒，多带儿子玩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又是漫长的十几年过去。时间过得太快，我忙着生活，忙着追名逐利。每年能够见到母亲，就是春节期间。我带着两个孩子，按惯例去给他们的爷爷上坟。母亲会过来，在堂弟家门口，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女。当年她带过一段时间的孙子，如今已长成一个1.75米的大块头。在那短暂的半个多小时里，妻子、孩子与我的母亲，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那样，平静又愉快地说着话，笑着，拍打肩膀，拥抱，再不舍地告别。我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并不凑上前去。还是不知道该和母亲说点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吧。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开始无声地流泪。

（步步清风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4日，李小光图）

等春天 ●王鼎钧

等什么？等春天。

春天来了等什么？等诗。

冬天要抗寒，夏天要抗热。到春天，什么也无须抵抗，全身放松，望着蜘蛛吊在发亮的细丝上荡秋千，目的可不是发明钟摆。

心门敞开。为了诗，不设防。

（唐丽光摘）

带着鲑鱼去旅行

●〔意〕安伯托·艾柯
◎艾俏 马淑艳 译

报上说，现代世界有两大困扰：电脑入侵和第三世界大肆扩张。这话说得太精辟了，对此我已亲身领教过。

最近我出了趟小差：斯德哥尔摩一天，伦敦3天。在斯德哥尔摩，趁一小时的空闲，我买了条熏鲑鱼，那鱼个头奇大，又极便宜。虽然有塑料袋包装，但卖鱼人建议我在旅途中最好把它放进冰箱。哈哈，那就试试吧。

运气真不错，伦敦的出版商为我预订了一家豪华宾馆，房间里配有小酒柜。我兴冲冲进了宾馆，却以为自己闯进了义和团起义时的某个国家的驻京公使馆。不少旅客全家在大厅里安营扎寨，裹着毯子，与他们的行李睡在一块儿。到服务台一打听，才得知原来就在我到来的前一天，这家豪华宾馆里

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还没等故障完全排除，又死机整整两小时。没有电脑记录，工作人员对房间的入住情况完全茫然。我只好在一旁干等。

傍晚时分系统终于被修复了，我总算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记挂着那条鲑鱼，我赶紧把它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打算放进小酒柜。一般宾馆里，小酒柜是一个冰箱，里面有两瓶啤酒、几小瓶烈酒、几罐果汁，还有两包花生米什么的。但我住的那家宾馆的冰箱却是家庭型的，里头的威士忌、杜松子酒、苏格兰威士忌利口酒、拿破仑干邑等足足有50瓶，矿泉水则有8大瓶巴黎水、两瓶伟图矿泉水、两瓶依云，还有3小瓶香槟，许多罐健力士黑啤、淡啤酒、荷兰啤酒、德国啤酒，以及从法国与意大利进口的白葡萄酒；零食则除了花生米，还有各种小点心、杏仁、巧克力……根本腾不出空间来放鲑鱼。我便把化妆台的两个大抽屉拉开，把冰箱的存货搬进去，然后把鲑鱼放进了冰箱，随后就把这档事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下午4点我回到房间，看见鲑鱼在桌子上，冰箱里又被塞满了各种美食，满满当当，不留一丝空隙。打开抽屉，我发现前一天放进去的东西原封未动。我便打电话给服务台，要他转告房间清洁人员，冰箱变得空空荡荡不是因为我把里头的东西全吃光了，而是为了放鲑鱼。他回答说，所有这类要求都必须输入电脑中央系统，因为大部分职员都不会说英语，无法口头指挥。打完电话，我自己也没闲着：我又拉出另外两个抽屉，把冰箱清空，然后重新把鲑鱼冷藏起来。

第三天下午4点，鲑鱼又回到了桌子上，而且已经开始散发异味。冰箱里再次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化妆台的那4个大抽屉仿佛禁酒巅峰时期地下酒吧的密室。我再次打电话给服务台，他们的电脑又出问题了。我按铃叫来客房服务员，向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子解释我的难题。他唯一会说的那种语言，后来据我的学人类学专业的同事告诉我，是一种只通行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





自渡彼岸 ●雪小禅

那年，他17岁。

家贫。过年吃饺子，只有爷爷奶奶可以吃到白面包的饺子。母亲把榆树皮磨成粉，再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这样可以把馅儿裹住，不散——单用玉米面包饺子包不成。那种榆树皮饺子难以下咽。记忆中，可以分得两个白面饺子，小心翼翼吞咽，生怕遗漏了什么，但到底还是遗漏了——还未知是何滋味，已经咽下肚去。

衣裳更是因陋就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裤子上常常有补丁，有好多年只穿一两件衣服，撑到上班，仍然穿带补丁的衣裳，照相的时候去借人家的衣服……

记忆最深的是他17岁那年的冬天，同村邻居有个18岁少年，有亲戚在东北林场，说可以上山拉木头，一天能挣30多块钱。他听了心动，于是两人约了去运木头，尚不知东北有多冷。他至今记得当时多兴奋，亦记得那地名——额尔古纳左旗，牛耳河畔，中苏边境，零下49摄氏度，滴水成冰。

每日早上5点起床，步行20公里上山。冰天雪地，雪一米多厚。拉着一辆空车上山，一步一滑。哪里有秋衣、秋裤？只有母亲做的棉衣、棉裤，风雪灌进去，冷得似乎连骨头缝里都在响。眉毛是白的，眼睫毛也是白的，哈出的气变成霜，衣服里鼓鼓的是两个窝窝头。怕窝窝头冻成硬块，于是用白布缠了，紧紧贴在肚皮上，身体的温度暖着它，它就不至于被冻成硬块咬不动。

不能走慢了，真的会冻死人。拉着车一路小跑，上山要4个多小时。前胸、后背全是汗时，山顶到了。坐下吃饭，那饭便是两个贴在身上的窝窝头，就着雪。到处是雪，一把把吞到肚子里去。才17岁，那雪的滋味永生难忘。

然后装上一车木头，往山下走。下山容易些，只需控制车的平衡。上山4个小时，下山两个小时，回来时天就黑了。

那是他少年时的林海雪原。

进了屋用雪搓手、搓脚、搓耳朵，怕冻僵的手脚突然一遇热坏死掉。脱掉被汗浸透的棉衣，烤在火墙边，换另一套前一天穿过的棉衣。晚餐依然是窝窝头。第二天早上照样5点起，周而复始。

一个月之后离开时，怀揣1000元钱。1000元钱在20世纪70年代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二十几块钱。

回家后，母亲看着他后背上被勒出一道道紫红的伤痕，号啕大哭。

那1000元钱，给家里盖了5间大瓦房。他说起时，轻声细语，仿佛在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者潸然泪下。

光阴里每一步全是修行，不自知间，早已自渡。那零下49摄氏度的牛耳河，霸占着他17岁的青春，直至老去，不可泯灭。

（刘 振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娜娜时代喀非里斯坦地区的方言。

退房那天我下楼去签单。乖乖！上头简直是天文数字！账单显示，我在两天半之中，喝掉了几百升的凯歌夫人香槟，10升各种威士忌（包括几种非常罕见的纯酿麦芽酒），8升杜松子酒，25升矿泉水，很多很多的果汁——多得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所有儿童预防坏血病，还有多到令人想吐的杏仁、胡桃和花生米。我想解释，但满脸堆笑、

露着槟榔牙的服务员向我保证，这是电脑记录。我要求找律师（advocate），他们却给我送上一个鳄梨（avocado）。

这下子我的出版商大为光火，他认定我是个胡吃海喝的揩油老手。鲑鱼已经变了质，当然吃不成了。孩子们则勒令我今后要少喝酒。

（周文燕摘自中信出版社《带着鲑鱼去旅行》一书，冯 煌图）



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

◎白岩松

每当失败与挫折来临时，你应该怀着好奇心去看待它，试图弄明白它的目的：难道这是一次提醒？难道我应该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

当下是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在中国，很多扭曲和乱象，都与追求表面上的成功有关。我们往往只追求现实的结果，不追求真理；我们把结果看得非常重，因此我们无法享受过程；我们为了实现某个愿望，往往不择手段。

2012年，我参与了伦敦奥运会的报道。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是“影响一代人”。有记者提

问：“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这句话很平常，在中国，很多事都能教孩子们如何去赢。但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格外感动：“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这是中国人很缺乏的一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体面

并且有尊严地输？

我记住了这句话。一方面，它让我更加明白，为什么体育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此时的中国。

其实老祖宗早已明白这个道理，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既然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么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教“十有八九”时人的心态和应对方法？相反，十之一二的成功，被看得极其重要；十之八九的挫折，也被放大到无以复加。

回头看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想想看，失败很可怕吗？中国有无数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失败，而不是因为成功。

岳飞是因为成功才伟大吗？如果我们从现在的“成功学”角度来看，岳飞很失败。不管仗打得怎么样，岳飞终究被朝廷用十二道金字令牌召回，最后还给“办”了。在当时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当时的成功者是谁？是秦桧。可是后来呢？秦桧一直在西湖边上跪着，但岳飞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

项羽是成功者吗？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将领，项羽已经失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吧？但是他仍然以英雄的形象，存留于中国的戏剧故事和百姓谈论当中。反倒是“成功者”刘邦，会让我们在心里产生某种不屑或者不那么喜欢的感觉。

林则徐的人生成功吗？大家只记住了“虎门销烟”，却不知道在很多“妥协派”的压力之下，一年之后林则徐被免去职务。从功名的角度来说，他成功吗？一点儿也不。



人活着最需要什么？大约，只有将死的时候才看得最清吧。

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就从别人的死里获得了生的经验。明亡之后，他选择了隐居。据说，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在雪交亭枯坐，一坐就是好长时间，连天色将晚都浑然不觉。疲倦的时候，就到田垄之间走走，走累了，就回来坐坐。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清寂地过。

有一件家具可以作为佐证。他所趴的那张桌子，日久天长，竟然留下了双肘的印痕。

黄宗羲说，他是个死过好多次的人。清政府悬赏捉拿过他两次，指明要逮捕他一次，他被围困在城里一次，被揭发谋反两三次，另外，还有一次差点在沙地里气绝。真可谓九死一生。

为什么要补上失败这一课？不仅仅是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更因为生命从诞生开始，就是一条单行线，直奔死亡而去。就算你赢了全世界，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死亡，是最大的“失败”，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失败，其实有很多意义，这些意义比成功大，或者说有一种成功必须是以失败作为助推力的。南唐李后主的失败极其惨痛，我们想要经历那样的失败都很难。但我们至今仍在谈论他，为什么？因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者，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国破家亡，他会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种感怀吗？不会。这个失败对于李后主固然惨痛，但对于后人，对于文学的传



看透

●马德

黄宗羲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他故意绕个弯子，谈及历史上的两个人，一个是秦相李斯，一个是西晋的名士陆机。李斯将要被腰斩的时候，回过头来对二儿子说：“我多想跟你一块儿牵着猎

狗，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在他的文字中，失败，竟然有一种美妙的意境。

莫扎特生前在家乡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屡受排挤，命运多舛。他是一个天才。他一生中创作的音乐作品，交给普通人抄谱，终生都未必抄得完。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你听不到失败，听不到挫折，听不到身世的飘零和难言之隐。他的音乐，永远是人世间原本美好的那种存在。

还有很多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人生中的不幸、挫折和难过，才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苏轼的作品好，但苏轼的宦官生涯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他屡屡被排挤，被贬谪，即便这样，他仍然留下了传世的佳作，连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也找到了别出心裁的出口，否则，

狗，到咱们上蔡县的东门去打野兔啊。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陆机临死的时候，也曾经感叹说：“唉，华亭的鹤鸣声，从此再也听不到了。”

黄宗羲觉得，李斯和陆机临死时所遗憾不能做到的，他现在都可以做到，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他接着说：“不自爱惜，而费之于庆吊吉凶之间，九原可作，李斯、陆机其不以吾为怪乎！”意思是，如果我还把人生浪费在琐碎之事中，而不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李斯和陆机若能死而复生，一定会笑话我的。

对于人生，有的人看不明白，有的人看明白了而做不到。黄宗羲大概就是那个既看得透彻又活得清醒的人吧。

（赵丽娟摘自《今晚报》2015年5月25日，董克诚图）

“东坡肉”是哪儿来的？所以，以史为鉴，回归到个人，我们应该知道，有时我们是需要失败的，而且失败是伟大创作的重要动因。

此外，我们还应该明白，挫折与失败原本就为变革提供了机会。要知道，人在胜利的时候不必做出决定，但在失败的时候要做出决定。

做出决定，往往意味着一种变革的开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当失败与挫折来临，你应该怀着好奇心去看待它，试图弄明白它的目的：难道这是一次提醒？难道我应该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

（妍欣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白说》一书，勾犇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小男孩和他的朋友

◎ [澳大利亚] Mascotte/图

2013年，澳大利亚男孩 Noah Bloom 在图书馆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善良的 Noah 将小鸟带到医院救治，并带回家悉心照顾。后来，恢复健康的小鸟被 Noah 及其家人收养，并取名为 Penguin。





摄影师 Mascotte 用镜头记录下这对好朋友快乐的日常瞬间，并发到网络上，希望更多人能够感受到人与动物本应如此和谐。

现在 Penguin 对于 Bloom 一家来说就像家人一样，他们同吃、同住、同玩耍。Penguin 的存在让孩子们变得更加善良，更加乐于帮助弱小。





听到门框响时我正在睡梦中。我迅速睁开双眼，立马从桌子下面睡觉的地方坐起来。完了！这么早就有人来上班？我隔着办公桌向外望，生怕被别人看到。早晨的阳光穿过办公室前门的随手涂鸦照射进来，倾泻在我面前迷宫般的桌子上。看不到一个人，我松了一口气。可能只是妄想症。

生活在10平方英尺（约0.93平方米）的工作站，有一点妄想症大有帮助。我站起来，伸展四肢，然后弯腰收起空气床垫。时钟显示为早晨6:45。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时间我仍旧睡着，但目前的情况很不正常。

这周早些时候，我悄悄搬到了办公室。这个月我把自己位于威尼斯海滩的公寓租了出去，把衣物和珍贵物品打包成几件行李，开始在办公桌后定居，小心使用众人视线之外的每一平方厘米来存放我的物品。谁都不会希望被同事发现在办公桌边穿着三角裤，而且是在早晨6点钟。这种事我不会跟别人说。每天早上我收拾好个人物品后，把空调温度调低到72°F（约合22.2℃）——他们离开后整夜都是这个温度的话，对我来说太低了。接下来我去晨练、淋浴，并确保我并不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有时我甚至故意让自己迟到，指责洛杉矶糟糕的交通——只为了合群。虽然搬到办公室住前期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但与每月付房租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

穷困落寞

搬到洛杉矶已两年，和许多洛杉矶人一样，我破产了。我放宽了租房要求，找了一间距离单位20分钟车程的单身

公寓，把私人物品塞进这个250平方英尺（约23.23平方米）、美其名曰“经济公寓”的地方，而我的积蓄像点燃的香烟一样在日光中消失。我把旅行和写作的梦想束之高阁，以便换来一个稳定的居住环境，当时我以为自己可以忍受。

2012年夏天，这些梦想给噩梦让路了。我打两份工，每周工作60小时来确保能付房租，几乎没时间放松。然后灾难出现了。公司的薪水和奖金被冻结，我的身份证被盗。那年年初，由于外科手术，我欠医院一大笔钱。助学贷款和车贷要还，房租每年肯定会达到洛杉矶法律规定的最高涨幅。我开始想：我的美国梦到底怎么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没有钱，我只有两个选择：放弃创造性工作的梦想或者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这两条路的前景都很暗淡，直到我想起还有一张倒扣的王牌。

几个月之前，为了深夜赶工，我去办公室，附近所有地方都关门了，商业广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空白点，从白天的喧闹中剥离出来。那段时间，新闻里充斥着大量美国国会议员把他们的华盛顿办公室当作住所的故事。他们把那些被忽视的宜居空间完美地转化成工薪白领的瓦尔登酒店。我想过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但在必须这样做之前，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我绝不是个重视金钱胜过时间的人。成长在墨西哥湾附近的小镇，我的生活更多与社区而非利益相关。我父母强调成就，也支持休闲。我妹妹和我被督促着，各门功课都得

移居办公室

◎〔美〕特里·凯恩

◎斯眉译





是A，才能获得年度公路旅行假期。当妹妹成为一名律师时，我慢慢进入艺术领域，把时髦学校的研究生学位放到一边，尝试表演和写作，一周工作40个小时来支付账单。

我不是普通的无家可归之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我看起来像典型的中产阶级职场新人——外表清秀，善于辞令，穿着考究，讲究卫生。但在“无家可归”和“中产阶级”之间，一度宽阔的鸿沟已被缩减得仅剩一条断层线。在此之上，许多人发现自己位于飘忽不定的边界上，只要有一点坏消息，就会失去一切。

把办公室变成家

住在办公室是解决房价过高困局的独特办法，但还有选择。许多工作的人正在不同程度运用极简主义，在飙升的生活成本和停滞不前的工资之间寻找平衡。从住在车里的饥饿艺术家，到搬进小房间的中产阶级，从住在垃圾箱里的大学教授，到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阶层，美国人对“家”的定义都在改变。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家的本质是我们的生存基础。相对于“无家可归”，我更愿意使用“随遇而安”一词，既崇尚选择权，又不会削弱没有这种选择的人们所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起初的暂时性经济手段逐渐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我逐渐爱上了它。迫在眉睫的债务转变为稳定的积蓄，游走于两份工作之间，我竟然挤出了许多休息时间。我戒掉乱花钱的习惯，存款剧增。最后我干脆不租房了，把大部分东西丢掉，开始过一种简单的工薪生活。

我每天的生活更加丰富。夏天，我飞到加勒比，花两周拍了一部电影；在美国南部，我和一位美女欢度新年，又开始读书、创作。这种生活方式促使我燃起热情。我更频繁地进行社交，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以前我天天围着公寓打转转，现在则以我的爱好为中心，我更开心了，人们开始注意到我。

住在办公室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当公司出现调低预算的信号时，我开始为将来做打算。我希望有怎样的后办公室生活？老朋友罗伯特一月份搬到镇上，想和我成为室友。我们开始寻找公寓。

但有些事似乎不对劲。一年多不用付房租，我

意识到自己的消费观已经不一样了。每月把钱花到同一个地方，让人感觉产出应该远远大于投入。

再次无家可归

我已经在办公室里住了500天，最终这个公司倒闭了。我成了第一批失业者，丢了工作，没地方住，但是，我在生活花费和通勤中省下超过2万美元。在职最后一天，我被邀请去一家竞争对手的公司面试。我承认自己不符合工作条件——一份行政级别的职位，每周不停地工作，还有上百万美元的筹资计划。我去应聘这份工作，感觉就像在和超级名模约会——仅仅因为她邀请了我。我几乎拒绝了，但头脑中一个纠缠不休的声音在其他方面说服了我。

在面试结束时，我知道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但好奇心不可动摇。

“你有其他问题吗？”面试官问。“其实，有。”我微笑着答道，“跟我说说你们的办公室。”最终我没有干这份工作。

这些日子我的睡眠质量很好。我发现自己在日出前醒来，但这次的动作很缓慢，为了不让头撞到包着毯子的低矮天花板。我从窗户望出去，月光映射在水面，海浪戏耍着岩石海岸，声音回响着穿过太平洋海岸公路边的停车位。

在我自己的卡车后面，有一张配有海绵床垫的单人床，两边是小型书架和多功能柜。这是我的新住所，四个轮子上的定制小家，很适合在去俄勒冈的一系列景点和国家森林的路上过夜。

离开办公室之前我就把它做好了。我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一间胶合板预制房屋，可容纳一台小型冰箱、一个可携带式丁烷气炉、一个结实的水壶，还有一个纸巾架。我庆幸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到这些。多数时候我待在当地，一边写作，一边打一些零工，追求我一直想要尝试却没时间去尝试的事业。

这并不适合每个人，但我很开心。平常一周之内，我会把20个小时的工作放到几天里完成：一份兼职工作是在好莱坞做安防，另一份主要是和弱势青年一起工作。剩下的时间用来写作。有别于全职工作的是物质收益不多，但利大于弊。现在我走到哪儿，就把家带到哪儿。

家都有了，我还有什么别的奢望呢？



（巍 巍摘自《海外文摘》2015年第8期，小黑孩图）



一

最早使我感到诗的是什么？是雨滴。

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棵塔松，每当我从它身边走过时，它什么都不说。

一天，是雨后吧，世界洁净而新鲜，塔松忽然闪耀起来，枝叶上挂满了晶亮的雨滴，我忘记了自己。我看见每粒水滴中，都有彩虹游动，都有一片精美的蓝色天空，都有我和世界……我知道了，一滴微小的雨水，也能包容一切，净化一切。在雨滴中闪现的世界，比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更纯、更美。

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

二

我是在一片碱滩上长大的孩子。

那里的天地非常完美，是完美的正圆形。没有山、没有树，甚至没有人造的几何体——房屋——使这样的完美稍稍损坏。

当我走在我想象的路上时，天地间只有我，和一种淡紫色的草。

草是在苦咸的土地上长出来的，那么细小，又那么密集，站在天空下，站在乌云和烈日下，迎着不可避免的一切。没有谁知道它们，没有彩蝶、蜜蜂，没有惊奇的叹息、赞美，然而，它们却生长着，并开出小小的花来，骄傲地举过头顶……它们告诉我春天来了，告诉我诗的责任。

三

在礁岩中，有一片小沙滩。



学诗笔记

●顾城

沙滩上，有不少潮汐留下的贝壳，已经多少年了，依旧那么安详、美丽。

我停下来，吸引我的却不是那些彩贝，而是一个极普通的螺壳。它毫无端庄之态，独自在浅浅的积水中飞跑。我捉住它，才发现里边原来藏着一只小蟹——生命。

这只小蟹，教给我怎样选择词汇。

一句生机勃勃而别具一格的口语，胜过十打华美而古老的文辞。

四

由于渴望，我常常走向社会的边缘。

前面是草、云、海，是绿色、白色、蓝色的自然。这洁净的色彩，抹去了闹市的浮尘，使

我的心恢复了感知。

我是在记忆吗？似乎也在回忆，因为我在成为人之前，就是它们中的一员。我曾像猛犸的巨齿那样弯曲，我曾像叶子那样天真，我曾像蜉蝣那样，渺小而愉快，我曾像云那样自由……我感谢自然，它使我感到了自己，感到了无数生命和非生命的历史；我感谢自然，感谢它继续给我的一切——诗和歌。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紧迫的征战中，在机械的轰鸣中，我仍然用最美的声音，低低地说：

我是你的。

五

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

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

沙漠梦想着云的背影，花朵梦想着蝴蝶的轻吻，露滴梦想着海洋……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

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的童话时，浅浅的脑海里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了身后的暗影。只有路，自由的路。

我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行走。

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

如果可能，我将幸福地失落，在冥冥之中。

（六月的雨摘自中信出版社《给孩子的散文》一书，庞彦图）

盼情书

●〔日〕清少纳言

◎黄悦生 译

往常那人回去后总会寄来情书，可是某日却忽然说：“这又何苦呢？事到如今，也不必再说什么了吧！”说罢便回去了，次日也杳无音信。

天亮后，女人见没有书信送来，心里非常失落，心想：没想到他竟如此绝情！

就这样过了一天。次日中午，下起滂沱大雨，仍然没有对方的消息。女人心想：看来真的是一刀两断了。

傍晚时分，她正坐在廊檐下，忽见有个童仆撑着伞送信过来，便异常急切地打开来看。信里只写了一句：“雨落水涨。”寥寥数字，却比千言万语更加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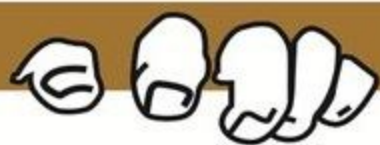
（杨若尘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枕草子》一书）

轻微美德

●连岳

二十年前，有研究者与世界银行合作，试图从活跃在社会里的细微价值观着手，分析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

研究者出了三个测试题目：一、此地的人是不是无条件尊重父母，即无论自己的父母品质如何、有何过失，都必须爱他们、尊重他们？答案越倾向于“是”，得分越高。二、有多少人反对离婚，认为离婚无理且负面？反对的人越多，得分越高。三、每位女性的平均生育数目。生得越多，得分越高。这三个判断，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我们的得分，可能你也猜



意 · 林



得出来。

结论是，得分高的国家往往腐败程度比较严重，得分最低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该地区的腐败程度最轻。

腐败是个大话题，似乎只与公权力有关，和巨款、情人之类挂钩，遥远得像月亮。但它是藏在小事里的：无条件尊重父母，则无大是非；反对离婚及妇女生育率高，则证明这个群体公众平等观念淡薄。

在小事上有轻微的美德，任何一家店都童叟无欺，女人脸上有轻松的笑容，这样的地方，大事一般差不了。

（格格摘自中华书局《走神：连岳城市画报专栏十年精选》一书）

文明的精神

◎晏建怀

文明之于一个国家，是国民的自觉行为所体现出的素质与精神。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说：“某人似

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却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所谓文明的精神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这说明，光有高铁、飞机和摩天大楼这些光鲜的外表，并不等于有“文明的精神”；就像富豪不等于贵族，玩奢侈品不等于有品位一样。

（若子摘自《今晚报》2015年8月3日）

小斋

◎倪匡

在元代画家倪云林题他自己的书房的诗中，有“小斋容膝度年华”之句，意念之落寞和无可奈何，逼人而来，读了之后，只好长叹一声。

倪瓒（倪云林）的一生，和一个“淡”字分不开。然而，心境再淡，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来：“在仅可容膝的小空间中，生命就这样渐渐溜走了！”

生命逐步溜走，这是生命的铁律，本来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惘然。在斗室中任由生命溜走是惘然，即使在广厦之中又如何，还不是一样惘然？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人提出，内在的空间才重要，那是无穷大的，你所能想到的，皆属于你生命中的领地。

听起来，伟大得很。少年时、青年时，也曾为这种伟大的话而倾倒。但是年事渐长，知道这种伟大的话，大都是空话，空泛得不着边际，自然也就只好实实在在地，小斋容膝了。

（六月的雨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生活体验》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如果痛苦没有终点

◎罗拉·赫夫林格 ◎王 微编译

家庭美满但肉体痛苦

安妮·巴斯在不幸瘫痪的23年里，饱受骨质疏松症之苦。她的骨骼变得格外脆弱，股骨、椎骨和左下肋骨都骨折过，错位的骨头推挤着器官，令她痛苦不堪。最可怕的是，这痛苦没有终点。

她和丈夫婚姻美满。丈夫做饭时，她在一旁削着土豆皮，为有趣的笑话而乐个不停。但年复一年，在痛苦中开始、在痛苦中结束的每一天令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这位75岁的荷兰老妇人申请安乐死已经一年了，但她的请求没有获得通过。在荷兰，一个人必须证明自己正承受巨大的痛苦或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才能接受安乐死。一般情况下，家庭医生有权裁决患者是否可以采取安乐死，但巴斯的医生拒绝了她的要求。她的丈夫坚持要照顾她，女儿也对她万分不舍。

巴斯转而向“生命终结”诊所求助。这家位于海牙的诊所没有床位，病人不会死在那里。多数情况下，诊所派遣医生协助病人在家中结束生命。接到巴斯的请求后，诊所派出了康斯坦斯·德弗里斯医生去判断她是否符合安乐死的条件。

2014年8月27日，德弗里斯医生和巴斯正式见了面。按照“生命终结”诊所的标准程序，协助者和病人需要见6次面，初次和最后一次之间相隔4个月，每次电话和面访时的录音都要保留。

经过数次交谈，德弗里斯理解了巴斯的痛苦：一个人可以像她这样活一段时间，但很难经年累月地苦熬。

最终，“生命终结”诊所判断巴斯“头脑清醒，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医生们商议后一致认为她符合安乐死的标准。

生命之重

2002年，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一年后，1815人在该国寻求安乐死；到2013年，升至4829人，达到全国死亡人数的3%。

人们持续提出一个敏感问题：社会将协助自杀合法化，但它的界限在哪里？2014年，1854名荷兰公民自行结束了生命。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不应轻易放弃每一条生命，但支持者相信，与其让这些用痛苦的方式自杀，不如给他们有尊严的死亡。

过去，安乐死的大多数申请者患癌症已达晚期，但近年来，申请者中患抑郁、精神分裂和焦虑等精神疾病的人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都是颇具挑战性的情况，因为监督机构很难判定他们是否真的承受不住“生命之重”。

荷兰监督机构不久前斥责了一名医生，因为他帮助一位患有耳鸣的47岁母亲自杀。机构认为此人并非无可挽回，医生判断有误。这是“生命终结”诊所一年内收到的第三次警告。

而对每一个寻死的病人，德弗里斯医生都得进行艰难的抉择：该不该帮这个人死去？

82岁的K女士曾向她寻求帮助。K女士举目无亲，电视、互联网是她与外界接触仅有的渠道。年轻时她一直想要孩子，但丈夫在飞机事故中意外身亡，从那之后，她觉得自己虽然活着，但生命好像已经结束了。

生活在困境里的K女士令德弗里斯十分同情——在绝望中周而复始，日复一日，但法律并不支持这样的人结束生命。德弗里斯想帮她，但“生命终结”诊所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她身体健康。德弗里斯问她打算怎么办，她回答：“淹死我自己。”

不过，也有些人得到一点希望后，就能重拾生活的勇气。德弗里斯接触过一名糖尿病患者，她计划前往加勒比海阿鲁巴岛向妹妹告别，然后寻死。但在海岛的生活不但让



她晒得黝黑，精神也好了许多，再也不想自杀了。

决定踏出最后一步前，巴斯也犹豫不已。“我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好想享受生活。”她感慨。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德弗里斯劝道。

“如果不是这么痛苦，我真想好好活着。”最后，巴斯还是决定坚持初衷。

是救赎，还是错误

年轻时，巴斯是个快乐的姑娘，经常在酒吧跳舞，骑自行车到处跑。24岁时她成为母亲，44岁时成为祖母。日子平静地过下去，直到23年前，一次栓塞让她胸部以下瘫痪。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巴斯的生活仍然舒心：她住在大房子里，房门为方便她的轮椅进出而被拓宽；丈夫每天早晨从床上抱起她，给她洗个澡；晚上，床头备有她的止痛药和一杯热牛奶；如果睡觉时痛得厉害，丈夫会帮她翻翻身。

但这样的日子她已无法忍受了。她的床看上去和医院的病床无异，还放着尿不湿。凡事只能靠人照顾，“连口渴了都必须向人要水喝”。凌晨3点，丈夫需要将一颗栓剂放进她体内，这样早晨她才能在尿不湿上排泄。巴斯不想当个包袱，让丈夫睡不安生。如果自己再也没有能力享受生活，那为什么还要咬牙活下去？

2014年10月底，巴斯告诉家人，自己已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人世。“请不要死在家里。”丈夫多次劝阻无果后气愤地说，“我不希望生活在妻子离世的地方。”女儿则请求她：“为您的外孙子想想吧。”

然而，巴斯对死亡再也没有犹豫。无论家人如何劝阻，她还是决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两点接受安乐死。

丈夫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只要她愿意，我就

会一直照顾她，哪怕到100岁。”他说，自己无法决定是否该陪在妻子身边，看着她实施安乐死。

3个女儿而临着一整代人的道德冲突：对于巴斯这样的人，安乐死是救赎，还是可怕的错误？

对此，德弗里斯有自己的答案。“巴斯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一些人的明天，他们将被迫住在养老院里，因痴呆而依赖别人的护理。一些人认为，改善护理方式就能让患者生活得有希望，但很多人在乎的是自由。”

她指出，自己接触的那些寻求安乐死的患者都不想进“监狱一样”的养老院，他们将死亡视为解脱。为病人执行安乐死后，有时他们的亲属还会送花给她。

终点

巴斯是天主教教徒，接受安乐死的两天前，一位退休牧师帮她举行了告别仪式。另外两名牧师拒绝了，认为她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全家人一起观看了过去的家庭录像。

那一天很快到了，德弗里斯在那天看上去和往常一样，没什么特别之处。她已帮助10个人离开了世界，但不管做了多少次，她表示这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的日常工作。

下午1点45分，德弗里斯将车停在了巴斯家门口。巴斯的丈夫、女儿、外孙子和亲戚朋友都来了，他们围着她。一个女儿抓起母亲的手，眼睛哭得通红，而巴斯微笑着。

德弗里斯准备为巴斯注射药物了。

“你确定吗？”她问。

“是的，我确定。”巴斯笑着答道。丈夫走近她，二女儿紧紧抓住她的手，最小的女儿坐在她旁边问：“妈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巴斯开始哭泣，留下最后的遗言：“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她还叮嘱家人要守在一起，因为与家人共度的日子总是快乐的。

挂钟敲响了下午两点的钟声，巴斯的家中哭声一片，但她已感觉不到了。

（孙光星摘自《青年参考》2015年8月12日）





遇到困难你愿意求助吗

游识猷

2015年3月24日，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编号为4U9525的空客A320型客机，径直撞上法国阿尔卑斯山脉南麓，150名机上人员全部丧生。空难令人震惊，但此后的发现更令人难以置信——27岁的副驾驶卢比茨主动选择了撞毁飞机。调查人员随后发现，卢比茨可能患有抑郁症，同时，他的视力或许在持续恶化。视力和心理问题给卢比茨的职业前景罩上阴影，而他没有选择求助。

求助似乎从来不是首选项。遇到难题，很多人会试着自己解决，不行就上网搜搜办法，还不行，那就咬紧牙关等待，或许能熬过去。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求助？

不求助的表面理由是——“不麻烦别人”是美德。

更真实的理由是——如果开口求助，别人会认为我能力低下，我会因此丧失各种机会。

而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他人面前表现出众。

目标可分为两种，精熟型目标和绩效型目标。

精熟型目标更重视过程而非结果，其目的是自我提升，不是获得肯定。哪怕我现在还做不到，但通过不断努力也能有所进步。既然目标是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遇到困难时，自然就会寻求帮助。

而绩效型目标只看最终结果：你要么能做到，要么不能做到；要么力压众人表现出色，要么挑战失败沦为笑柄。如果目的是从他人那里获得肯定，感觉上像是示弱的求助就不会被列入选项。

沃顿商学院的研究者曾让学生们做7道智商测试题。被告知“每对一道题得一美元”的学生里，有73.5%的人在求助机会出现时选择了求助；被告知“其他人会给你打一个1至7之间的分数，根据分数得美元”的学生里，只有32.7%的人选择了求助。一旦目标不再是把事做好，而是让别人觉得我好，求

助的概率就会大大下降。

不幸的是，飞行员这个职业本身，自带绩效型目标。同僚和上司的评定十分重要——你要么优秀到可以让一机人以性命相托，要么资格不够，必须离开飞行员这个岗位。

类似卢比茨的不求助之人，其实并不少见。不过，绩效型目标者不知道的是，求助于他人，其实会提升此人对你的评价。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智慧过人，可以为别人传道、授业、解惑，而“懂得向聪明的我询问的人，一定也是聪明人”。

沃顿商学院的研究者发现，脑力竞赛中接到搭档求助的人，赛后给自己的搭档打了更高的能力分。2010年，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发现，老板其实更喜欢那些遇到困难会主动求援的下属。在某种意义上，“求指点迷津”可能是对老板最好的恭维。

说到底，不管目标是获得成长还是获得赞赏，求助都是帮你达成目标的大道。越早寻求帮助，就越有机会让自己获得成长，也越有可能掌握技能，从而成功解决问题，周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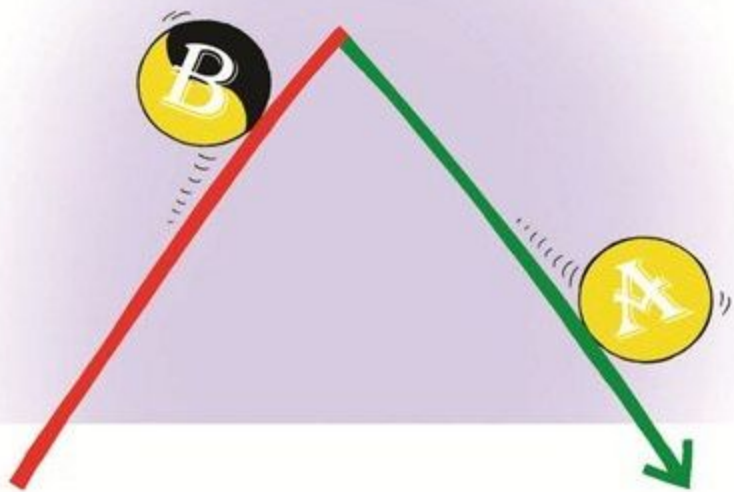
人对你的评价也会因此提升。反倒是不求助的人，万一拖到事情无法收拾，内部自信和外部评价都会落到极低。

在最后一次执飞之前，卢比茨有许多选择。他可以接受医生的帮助，在抗抑郁治疗中慢慢找回大脑正常思考的能力。他可以带上病历去求助公司，即使他无法再开飞机，也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然而，他选择了保持沉默。2015年3月24日10时29分，机长桑德海默离开驾驶舱，卢比茨反锁舱门接管飞机，操控飞机迅速下降。10时40分，4U9525右翼撞山。11分钟里，机长呼喊，乘客惊叫，卢比茨始终不发一言。

不求助的人，在悲剧发生的最后一刻，也只是沉默。

（莫难摘自《杭州日报》2015年8月5日，辛刚图）





炒股俱乐部里的组织学

◎何帆

在大的社会组织里，如果成员异质性太大，会给合作带来不利影响。但在小的社会组织如炒股俱乐部中，成员的异质性大些，反而能更好地发挥“多样性优势”，提升收益。

美国的第一家炒股俱乐部是在1898年建立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炒股俱乐部在美国成为时尚。当时有统计显示，53%的美国成年人持有股票，11%的人是各种各样的炒股俱乐部的成员。

从性质上讲，炒股俱乐部更像小型合伙制企业，其成员每月或每周定期聚会，每个成员都要演讲，介绍自己中意的股票，分析其财务状况，讨论其市场前景。然后，俱乐部成员会对每一只被推荐的股票举手表决，往往是在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决定投资。俱乐部成员的钱都汇到一处，共同投资，风险共担。

这些炒股俱乐部业绩如何？诚实的投资者表示：想跑赢大盘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往往费尽心机，还不如紧跟股指，或者干脆掷骰子随机决策。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的布鲁克·哈林顿曾调查了1245家炒股俱乐部，结果发现，其中96%没有跑赢大盘。

哈林顿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炒股俱乐部

五花八门，有的只招收男性成员，有的全都是女性成员，还有的是男女搭配的。总体而言，男女搭配的炒股俱乐部，收益率比单一性别的炒股俱乐部高2%。这看似不起眼，但日久天长，差距就显现了——假设两家炒股俱乐部各有15名成员，每人每月投入50美元，俱乐部A的年收益率是10%，俱乐部B的年收益率是12%。10年后，俱乐部B的总资产会比俱乐部A高出1.5万美元；再过5年，差距就会扩大到5万美元。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业绩。

为什么男女搭配的俱乐部会有这种潜在的“多样化优势”呢？

简而言之，男女的选股思路大有不同。男人选股更重视技术分析，女人更重视感觉和体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大家都是理性人，会在充分占有各种信息之后通盘考虑，寻找最优策略。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一旦选择范围超越了你我熟知的领域，人们就会无所适从。

试想一下，如果你到超市，只有5种果酱可选，或是有50种、500种不同的果酱，琳琅满目，供你挑选，哪种情形下你的选择会更合理？股市上的选择机会更是不知多了多少倍，信息越多人越迷茫。当信息量超过知识领地的疆界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收缩战线，退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组织的内部成员结构越多元化，他们的信息来源也就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可以避免在决策中出现盲点。

当然，组织内部有潜在的信息多元化优势，并不意味着在决策中就一定能发挥出这种优势。当面质疑别人，对人对己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什么时候都是一团和气，就会失去互相纠错的机会；但如果天天当堂对质、唇枪舌剑，又会伤害组织内部的团结。这就像走钢丝那样，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必要的张力。

另外，炒股俱乐部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以社交为主要目的，成员之间的同质性更强，是一种“社交伙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以工具为主要目的，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赚钱，是一种“生意伙伴”的关系。相比之下，“生意伙伴”俱乐部更能容忍不同意见。或许，这就是“群众的智慧”吧。

（曼宁摘自《青年参考》2015年7月15日，喻梁图）

◎董小源
编译



如果爱我， 请给我写封情书

—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沙利文·巴卢少校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爱你至死不渝……若我未能归来，亲爱的萨拉，永远不要忘记我对你的爱。”在前线无法自由行动的他，却有一颗与她紧紧绑在一起的心。他在信里写下了自己最后的愿望：“如果故去的人能够重回这个星球，并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飞绕于他们所爱的人周围，我将永远与你相随，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如果有轻柔的风儿拂过你的脸颊，那将是我的呼吸；如果有凉爽的风儿撩过你的鬓角，那将是我路过的灵魂。”

一周后，沙利文在布尔朗的

第一次战役中牺牲。幸运的是，他的承诺随着他的书信被送到了妻子手中。

二

迈克·罗伊科和卡罗尔·达克曼可谓青梅竹马。10岁时，迈克就爱上了卡罗尔，卡罗尔却对此一无所知。1952年，迈克加入美国空军，19岁时随部队到韩国。卡罗尔与住在她家附近的一个男人结了婚。

一天，迈克接到卡罗尔的信。她告诉他，她已和丈夫离婚，他们的婚姻根本就是个错误。迈克斟酌再三，写下回信，在信中他坦承自己对卡罗尔心仪已久：“我爱你很多年了。我在对你的思念中煎熬，也许你对我

的情感多少也了解一些。”为心目中的那个人写下情书，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如果没有她的信，也许此生他都不愿意正视自己对她的感情。迈克告诉卡罗尔：“我爱你如此之久，甚至无法记得心动起始于哪一刻。但当我决定为我的爱做些什么时，才发现你已成为别人的新娘。”

在迈克焦虑的期盼中，卡罗尔写来了回信。于是一页又一页饱含激情的信笺，满载着他的爱向她奔去。虽然卡罗尔的信中并无多少感情流露，但迈克并不介意：“我不会幻想你能同样热烈地爱着我。从很久之前我就知道，爱不是天平。”

然而迈克还是欣喜地发现，卡罗尔字里行间的爱意越来越浓，他兴奋地回应着：“你的信不仅让我成为这世上最快乐的男人，而且竟然还帮我提高了高尔夫比赛的成绩。接到你信的那天下午，我竟然打出了从未有过的好成绩……现在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我。”

“距离让一时的激情减退，却让真爱随时光滋长，犹如风过烛灭，风火却会交织在一起。”此时的迈克已经回到美国，随军驻扎在华盛顿西北部的布莱恩镇，却仍与卡罗尔相隔着半个美国的距离。但距离在迈克眼里并不是问题，他向爱人许诺：“我爱你，明天会比今天更爱你。”

在他们通信半年后，迈克得到几天假期，终于得以和卡罗尔团聚。他在家待了三天，在准备离开的那天晚上，他们订婚了。

“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富有、最英俊的丈夫，但是没有人会爱妻若我……那一



晚，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晚，因为你说了‘我爱你’。这三个字为我的生命掀开了新篇章。我把我的生命交付在你那美丽而富有柔情的手上。我爱你，我最亲爱的妻子。”

那一年的11月，他跟卡罗尔在华盛顿举行了婚礼并度了蜜月。

假期结束，新婚夫妇再次分离。迈克写信给新婚妻子：“因为分离，我如此忧伤。但当我看到婚戒，一想到你竟然已经成为我的妻，便又感觉好极了。我不停回想着我们蜜月的每个瞬间，念及你千万般的好。”

1955年1月，迈克被调到位于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的美国空军基地，他终于可以回到家乡与妻子长相厮守了。后来他成为一名全国知名的专栏作家。

在他的专栏里，曾经刊登过一个小故事《11月的永别》：

在24年的亲密时光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每逢周末就会来到他们位于湖畔的小木屋，相互依偎着倚在栏杆上，观看他们生命中最美的日落景象。不管他们正在做什么，到了日落时分，他们总会停下手头的活，一起默默地看着太阳没入水面，湖水被阳光浸染，由蓝色变为紫色，湖面由银波闪耀到一片漆黑……24年后，女人因病去世了。男人不得不离开这间每个角落都写满两人回忆的小屋。他特意在11月的一天来到这里，想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一切。但是他的动作怎么也快不起来，直到日落时分他还未离开木屋。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久违的夕阳入水的景象。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独自欣赏，却遗憾地发现，他不能。泪

水早已模糊了双眼，他唯有迅速转身离去。他拉下窗帘，锁紧大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多年后，迈克的两个儿子知道了父母的爱情故事，也读了《11月的永别》。但直到1997年迈克去世，他的儿子戴维在收拾遗物时才发现，父亲衣柜里的大盒子里放着父母所有的信。这些信让戴维真切地感受到了父母的情感。

三

佐治亚·欧姬芙是被誉为“美国毕加索”的著名女画家，在她与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相爱的31年时间里，书信往来超过25000封。根据欧姬芙的遗愿，这些信被封存在一起，与世隔绝多年。直到2011年，第一批精选书信才得以出版。“起初我想你能亲吻我，揽我入怀，哪怕只有一刻。但是当我念着你走出门去，突然发现阳光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温度时，才知道我其实想你能够触碰我的全部。”这是两人相识初期，欧姬芙写给施蒂格利茨的信。

施蒂格利茨回信：“你的信令我如获至宝，令我如此激动，我从未如此紧张，如此惧怕……从信里我能感受到你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它是如此神奇。”

“昨天，我收到你写来的四封信——这是多么高级别的待遇——它们如此贴心。”欧姬芙写道，“我把它们放在桌子上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样我想读的时候就能随时翻看。”

信里散发着狂热的爱的气息，施蒂格利茨说：“你对我的意义不止于你的躯体，我爱的不只是你的唇、你的手。我多么需要你，一如你是如此需要我

……我们灵魂的触碰跨越了空间的阻隔。因为你，我看到了世界上最绚丽的花朵、最稀有的颜色、最奇异的形状，我的周遭有一种爱的香味在静静蔓延……我听到了天籁。”“湖里、树上、土壤的气味里甚至风暴中，都有你的身影。你在最耀眼的闪电、最响的雷鸣里，你在黎明最神奇的色彩中，你无时不在，给我力量，巨大的力量。”

他们的信中充满了吻：“一个吻，两个吻，三个吻，等等，我先吃一个三明治，吃完再给你一个吻……来了，来了，一个轻柔的吻。”“我所有的爱都奔向你，我所能给予的吻都给你。”每封信都是以吻封缄：“给你无尽的吻，吻到令你难以呼吸”“送上晚安的吻”“小吻一下”“我以你所期待的方式吻你”……

四

为何不写封信呢，直接告诉你的另一半，你有多爱她（他）？当她（他）需要安慰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你的信，阅读那些文字。回忆被永远定格在字里行间，甜蜜会一下子冲淡因日常琐事而起的摩擦。

信笺是时间的记号，是爱的护身符，把最美的一刻永存。信让爱的世界如此自由，灵魂可以在其间起舞。为生命中的挚爱写下情书，允许自己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允许思绪随意把自己带向远方。当收到对方的回信时，我知道爱不是单向的，它正在我们之间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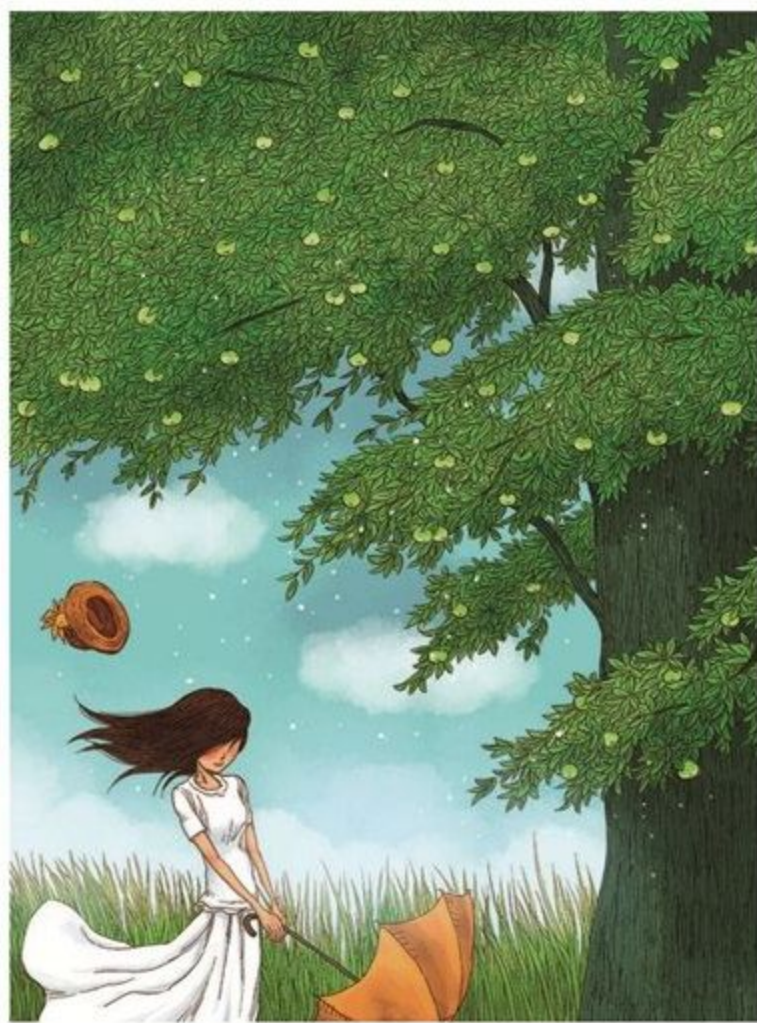
（压 寒 摘自《世界文化》2015年第8期，李晓林图）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风吹来时 / 你正在树下 / 你逃不及 / 湿了满衣
你的整个夏天都在下雨 / 躲在屋檐下落不完的点滴滴滴



天朝羽/图
清河鱼/文

也许已是许多年



一次一次梦想的甜蜜 / 在你的眼里 / 泪水盈盈
话说不尽可以埋在心底 / 爱得太深再无法遮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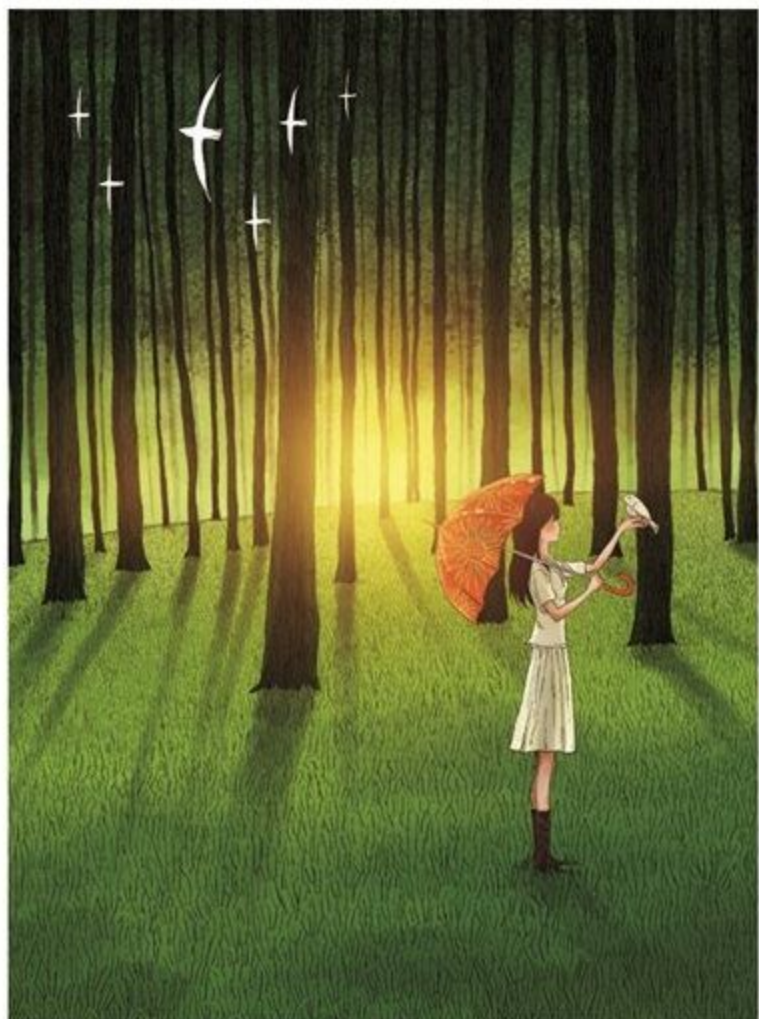


冷冷的空气你已不在意 / 慢慢坐下 / 不言不语
打开窗子 / 落红遍地 / 昨夜又是怎样的一番风雨

(选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也许已是许多年》一书)



《读者》与魅丽文化联袂打造的青春治愈
绘本与手绘涂色书《也许已是许多年》，2015
年9月底隆重上市，购买请扫描二维码



灰色的云朵消失在天际 / 悄然飘走了你的夏季
树梢摇落一片雨声 / 一群鸟儿飞来飞去



上海到蚌埠坐高铁只需两个小时。九点刚过，我在蚌埠南站拦下一辆去怀远县的班车，然后换小巴到双桥镇，再换更小的小巴。车厢被挤得满满当当，我和几只鹅坐在一起。窗外，初春的雨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烂泥地里。

晌午，一身泥巴的我站在张东村的村口。这段路，母亲当年要走上两天一夜。

我找到了张见本，他是40年前母亲的生产队队长，他身板依旧硬朗，蹲在门口捧着大碗喝红薯粥。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有个上海知青叫××，她是我母亲。他愣了好一会儿，突然蹦出一句：“我的个娘嘞，××的儿子。”

老队长放下粥碗，领着我去看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住过的土屋——早已是废墟一片，又指给我看他们耕过的地、走过的路。他对每个路过的老

人吼：“看看，××的儿子。”老人们张大了嘴。一位大娘攥着我的手不放，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0多年来，我是头一个回到村里的知青后代。

母亲是个平凡的人。我寻找的，不过是一段平凡的历史。

他们

●路明

二
母亲本不该去怀远。

1969年的秋天，16岁的母亲和同样热血沸腾的同学们响应领袖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九届的初中生“一片红”，统统下乡插队。母亲的第一志愿是黑龙江呼玛，只因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外婆心疼她身体弱，偷偷去学校找老师，把志愿改成了离上海较近的安徽省怀远县。

名单公布那天，母亲哭着回家，因为有同学说她是“叛徒”“逃兵”。和外婆大吵若干架后，1970年3月23日，母亲坐上了开往蚌埠的“知青专列”。上海站挤满了送别的人，火车开动，哭声一片。十几个小时坐到蚌埠，迎接的人群敲锣打鼓。向领袖宣誓后，母亲和同学们坐上卡车，直奔双桥公社，然后换驴车，最后步行6公里，才来到张东小队——被称为“怀远县的西伯利亚”的地方。

迎接知青们的第一顿晚餐是绿豆粳米饭，黑乎乎一坨。上海来的姑娘们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吃食，不知如何下口。一旁的村民悄悄咽着口水。六八届的老知青赶紧劝：“快吃吧，以后连这个都吃不上了。”

母亲诧异地发现，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孤儿特别多。有老人悄悄告诉她：“1962年断粮，连树皮都被扒光。年轻的父母听不得娃娃儿饿得整夜哭，一口稀粥留半口给娃。实在没力气了，就卸下门板，躺在家里等死。”

母亲和另外四个上海姑娘住进一间黄土夯的屋子。每天天不亮就出工，耨地、除草、打谷、喂猪，夏天看瓜田，冬天磨豆腐。晚上点着蜡烛学习领袖著作，写心得体会。最辛苦的是抢收麦子。早上四点不到，生产队队长张见本的起床号就吹响了。干四小时活，然后回村里吃早饭，吃的是红薯粥就着红薯馍馍，吃完一抹嘴再往地里赶。午饭在地头解决，红薯馍馍拌辣椒。母亲的腰酸到直不起来，跪在地上继续割麦子。等收工号响起，已是繁星满天。



回到屋里啃两口冷馍馍，倒头就睡，话都说不动了。

母亲憋着一口气，苦活累活抢着干，只为了不让农民看轻“城里来的姑娘”。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嘛。她是五个女知青中唯一的“妇女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8分8厘7。当时寄往上海的邮票8分钱一张，一天活干下来，寄封信的钱都不够。年底回上海探亲，大队会计一打算盘，刨去饭钱和其他开销，总共挣了10块钱。可就连这10块钱都发不下来。张队长过意不去，凑些黄豆、绿豆、粉条，还有极其珍贵的芝麻油，装在驴车上，送姑娘们去火车站。

母亲年年是标兵、知青代表，有机会去双桥公社或怀远县城开大会、听报告。开会是个美差，代表们自带面条，在会场统一下锅，拌上公家的芝麻油，喷香。有人教育母亲，开会前饿上两天。知青们干瘪的肠胃长期不见油水，一吃就拉肚子，拉完接着吃。某男知青吃到“两头冒”，最后被担架抬走，成就了一个传奇。

母亲的榜样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的梦想是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乡村女教师。那时上大学只有“工农兵大学生”一条路。1976年，公社下发一个读大学的名额，所有人都觉得非母亲莫属。公社领导找到她，语重心长，循循善诱，让她把名额让给另一个姑娘——“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明年一定送你读大学……”母亲答应了。不料1977年形势突变，“工农兵大学生”被取消，恢复高考。母亲让外公寄来复习资料，每晚看书到深夜，白天照样干活。不巧的是，考前一个月，母亲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肃的外公流泪了。

三

母亲说，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公社，她哭到昏死过去。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像无数狂热的少男少女一样，挥舞着“红宝书”，喊着震天的口号，任热泪横流。

母亲说，她也曾迷茫，甚至动摇过。第一次是外公被“打倒”。第二次是听说饿死人的事情。第三次最为刻骨铭心：公社有三个上海男知青，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从来出工不出力，一有机会就躲在屋里看书。1977年三人全部考上大学，风

光离开。母亲年年被评为标兵、模范，到头来只落下一身的伤病。

然而今天她依然相信，相信自己其实是幸福的，相信这世界上最壮丽的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相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她爱看老电影。看到《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一遍一遍呼喊“向我开炮”，不觉已泪流满面。

她不在乎自己的户口至今回不了上海，不在乎每月只有15元的“知青补助”，不在乎“半文盲”的学历，不在乎过度劳累带来的膝关节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

她常对着我叹气：“你们这代人啊，没有信仰。”

我很想说：我们不再相信，是因为你们什么都信。我们人人为己，是因为你们没有自己。

最虔诚的一代人养出了最叛逆的一代人，这何尝不是历史的讽刺。

他们承受着历史的剧变，几乎从未为自己而活过。当国家需要眼泪时，他们纵情地哭；需要歌颂时，他们真诚地笑；需要奉献时，他们付出了青春和汗水；需要理解时，他们说无怨无悔。他们像入戏太深的群众演员，演完了所有的悲喜剧，拿着一份盒饭默默离开。

他们从不讨价还价，命运却像个奸商。他们历经磨难，逆来顺受。时代一次又一次向他们索取，肆无忌惮，但这样的索取也不是没有报应的。

所有的意义和报应，都留到了今天。

我们这一代，享受着时代变迁带来的物质进步，却不再相信这个时代。

只需看一眼他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便没了意义。

四

两年前他们组织了一次初中同学聚会。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人，而今垂垂老矣。有人留在农村，成了最地道的农民；有人下岗多年，靠吃低保过活；更多人像母亲一样，日复一日地操劳，悄无声息地老去。没来的，有的是联系不上，有的已去世多年，当然，也有人混得好。

他们没忘记当初的理想，聊高兴了，一首一首唱起当年的歌。从《东方红》唱到《流浪者之歌》，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北京的金山上》，一起用力地“巴扎嘿”，纵然再也回不去了。

（昕 晔摘，李 晨图）



你跟自己处得来吗

●杨照

年轻的时候，我读过叶公超讲鲁迅的文章，到今天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比叶公超的这句话更能准确地描述鲁迅。叶公超说：“鲁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He can not even get along with himself.”这句英文的意思是：他跟他自己都搞不好，跟自己都处不来。我当时觉得叶公超讲鲁迅的这句英文太棒了！

然而年岁稍微大了一点，就发现其实叶公超用这句话形容鲁迅也不完全对。我的意思是，这话很有道理，但拿这话来讲鲁迅这个人，不再像我年轻时觉得的那么有道理。因为年轻时我觉得一个人不能与自己很好地相处是一件非常荒唐、可怕的事情。我认定鲁迅就是这种人。但年纪愈大我就愈感觉到，其实，真的没有多少人可以与自己很好地相处。想一想，你是否曾经认真地去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能够跟自己很好地相处吗？

年轻时不太会意识到这件事，因为有很多方法

可以让自己躲在热闹的人群中，让自己逃开单独一个人的境遇。或者再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发明了许多方法让人逃避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必须去面对自己，必须承认和自己相处没那么容易？只有当你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底跟自己处得好不好”的时候，才叫“独处”。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没有处在这样的状况。但是，我必须强调，人一直逃避和自己相处，终究还是会出问题的。

你可能有很多经验，但你不见得有体会。经验可以是外在的，是人家给的，可是体会只能靠自己。我想引用一首唐诗来解释这件事。

王维的诗《终南别业》的前两句：“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中年以后喜欢修道、学道，直到晚年才搬到南山边去住。后面两句：“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说当这个人有某种想法或感觉时，就一个人到山里而去。重要的是这句“胜事空自知”，通常很少有人会将这句话认真看待，因为后面的句子更广为人知。

“胜事空自知”的意思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碰到好多了不起的事，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接着是大家最熟的那两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结尾是：“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对我来讲，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胜事”两个字，或者说，我对这首诗的理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王维在帮我们解释，他遇到了什么“胜事”。

一般我们读到“胜事空自知”，会假想在山里而碰到外星人，或者发现了一大笔宝藏。大家讲的“胜事”，是指那种很稀奇、很了不起的事。但是王维说的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走到水的尽头，坐在那里看着，就在那个时候，山后头或山上，云浮起来。这不是我们普通人认为的“胜事”，但王维却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这首诗告诉了我们什么叫作“独处”——只有独处，你才会有“胜事空自知”的那种境界。

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标准，决定在你的经验里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了不起的。这些甚至无法去告诉别人，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才值得告诉别人。

每个人理解这首诗的方式不一样，我会把尾联的“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解释成：正因为你



为什么一定要有远大志向

●流 沙

乔森来自英国，他的父母有一个农庄。农庄里种着葡萄，每年采摘下来的葡萄用来酿造葡萄酒，产量虽不高，但可以在当地的商店里买到。在乔森的记忆里，这个农庄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想过农庄会有什么变化。乔森自己觉得，他将来也会像父亲一样，喝一点酒，然后在太阳很好的日子里，躺在农庄的草地上睡觉。

到中国后，乔森成了一名民办学校的外文老师。

有一天，乔森正在上课，发现教室外有一个人影晃动。乔森以为是校工，没有在意。但他发现那个“校工”一直站在窗外，招着手，嘴巴动着……乔森再看教室里，有个男孩想站起来又不敢，呆呆地看着窗外。

乔森于是问：“窗外的那个人，是找你的吗？”全班人突然哄堂大笑。

乔森非常纳闷。只见那个孩子站起来，跑到教室外，拉着那个人走了。

乔森后来才知道，窗外那个人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她给孩子送生活费来了。乔森还因为这个男孩知道了这所民办学校的许多事。

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因为升学率非常高，而且有外籍老师授课，所以学费昂贵，一年需要3万元左右，这相当于很多中国工人一年的全部收入。但是每年



招生时，这所学校仍然门庭若市，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想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上学，有的甚至为此举债。那个男孩来自农村，家境贫寒，男孩的生活费经常不够，于是他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送钱到学校来。这些钱也不知是她刚发的工资，还是借来的。

乔森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既然经济条件不允许，为何还要读这样高收费的学校？

后来，乔森与男孩有了一次交流。那个男孩说：“乔森老师，虽然我现在穷，但我有一个志向，我要好好读书，考上最好的大学，将来开公司，赚大钱，比班里那些嘲笑我的同学都更有钱，更有力量。”

眼前的“志向达人”令乔森大吃一惊。

乔森后来又问了不少孩子，发现这些孩子都有远大的志向——赚大钱、经营家族企业、娶美女、开豪车……而作为老师，他在祖辈传下来的农庄草地上晒太阳的梦想，显得太渺小。

乔森就这样被这些中国孩子的远大志向吓住了。乔森的父母从来没有告诉他，以后要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祖传的农庄做大，赚更多的钱什么的。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活着的目标，就是像父母一样，在庄园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中国孩子在志向上的咄咄逼人，让乔森感到了文化上的强烈反差。乔森讲不出谁对谁错，但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成功也不是这样的。

“不要成为志向达人！”乔森在他的课堂上一次次对他的学生们说。

（田龙华摘自《幸福·悦读》2015年第7期，魏克图）

有这样一种经过独处而来的、自己认为了不起的衡量事情的标准，你的内心才足够丰富，才能滔滔不绝地讲，才会跟一个林叟“谈笑无还期”。

在这个时代，也许因为不懂得独处，或者因为有太多方式可以逃避独处，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那种自信，也没有那种把握——在大千世界中、

人际关系上、生活中，自己决定什么是了不起的事。我们有一种恐慌，这种恐慌让我们需要一直在人群里面确认：到底别人的感受跟我一样不一样？到底别人的判断跟我一样不一样？

（余长生摘自《南方周末》2015年3月13日，刘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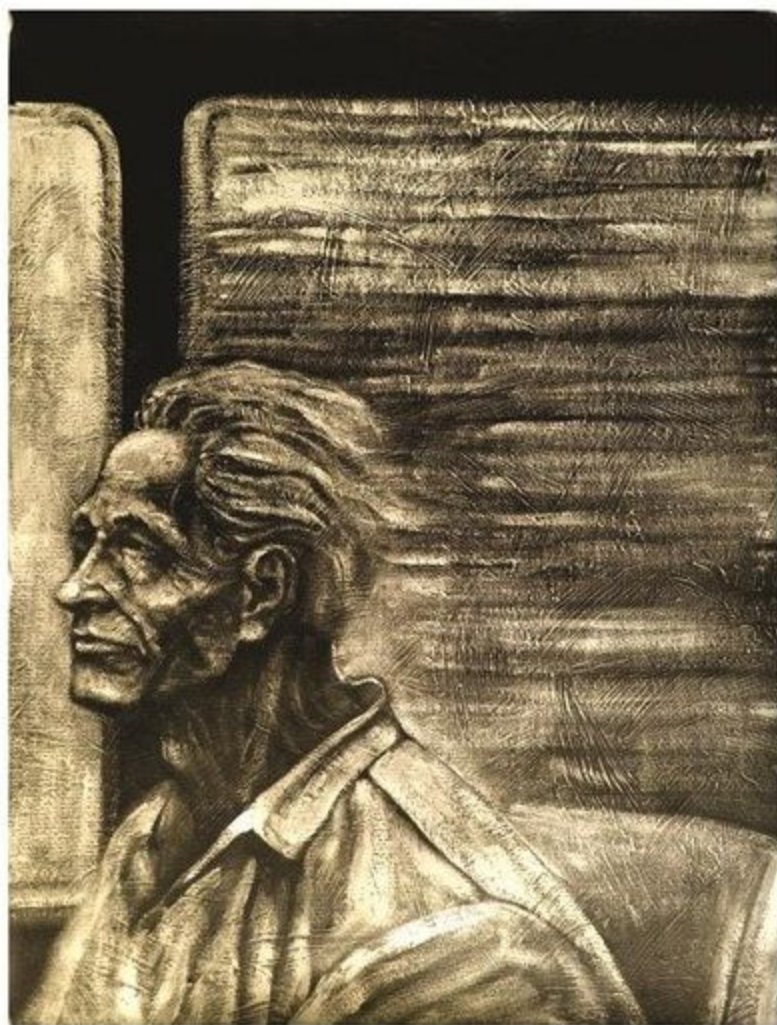


我登上公交车，刷了卡，转身看车厢内，座位都坐满了。往后移动几步，一位女孩子马上站起来，把座位让出。我向她点头道谢，就座。说老实话，我并不欢欣鼓舞。我宁愿她不让座，或者，过一会儿再让。她让得愈快，愈证明我的“老”之彰明。如果她看过我几眼，犹豫，不动，我至少有几秒钟沉浸于“逃过劫数”的侥幸。基于老人这一微妙的心理，我只让座给以下几类人：拄杖者、行走艰难者、一目了然的伤病人。介乎“很老”和“老”之间的女士，如果气宇轩昂，或者气宇虽不轩昂但珠光宝气，或施脂粉太浓厚者，则坚决不让，除非要教她难堪。

我坐的是“老人专座”，这也是那位女孩子赶紧让出的理由之一。我旁边和对面，坐的都是老人。辛弃疾词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的年龄，抵得成千上万位耆老的总和，它当然有把人看年轻、看顺眼的豁达和慈悲。至于老人互看，则和对镜近似。想到自己一个月前染的稀疏之发，棕黑色已褪尽，活像风中萧瑟的花白芦苇，更要承认，比起拥有一头直竖白发的左邻来，我的精气神差远了。好在右侧的“芳邻”一脸寿斑，神情呆木，也许会被我比下去，于是乎稍感心安。自然地，我对比自己老并比自己丑的右邻生了怜悯之心。是的，她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如果我还有明天。老人最为得意的反击语就是：你未必“来得及”变得和我一般老和丑。

左邻的头发是纯一不杂的白色，可以肯定，他没有使用任何类型的染发剂。他的衣领和肩膀上有一层白色头皮屑，而他的晴雨两用夹克是深蓝色的，使得白色的头皮屑格外抢眼。头皮屑没



老在巴士

●刘荒田

有诗意，换成比喻便中看一些：如雪花，如梨瓣。忽然记起北宋欧阳修的名句：“洛阳春色待君来，莫到落花飞似霰。”对了，它也如霰。而左邻对这等细微的不雅观之物并未觉察，一路镇定自若，向人间投出漠然的眼神。

刚才让座给我的女孩子，又

一次站起，让座给刚上车的老太太。我远远地向女孩致敬。唉，如果能够像她，让而不必被让，多好！如今，只能安分地坐着，妄想一个老得难以收拾的人上来，我起立让座，好满足一下虚荣心。

既然大势已去，怎么“老得漂亮一点点”就成了当务之急。

我一边尽量不看邻座的头皮屑，一边思考。第一条，务必加强反省。昨天我过马路，来车居然向我鸣笛，我戟指司机，申申而置。我不是冲他一个人，而是骂向坏习惯——不礼让行人。可是，骂完才省察，我为了贪快，走出了斑马线。第二条，是宽容。这是从反省来的。“老”意味着“过的桥多于人家走的路”，那么，过桥者犯错在走路者之先，所以，务必体谅犯错的年轻人。第三，把“老”的感觉和头皮屑一起掸掉。为什么一定对“老”耿耿于怀？老自由他老，照样过日子，过到“老”忍不住你的轻慢，突然给你来个下马威，到那时，再调整步行的幅度。但那也不是投降，而是和“老”和平共处。

这么思量着，车已到明珠广场。下车闲逛，看到一个广告——紫砂壶展览，遂绕道去看，最终没买。这出于“老得漂亮”的第四要素——好奇心。

（若子摘自《中老年时报》
2015年8月11日，宋德禄图）

一次，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和朋友格拉斯乘地铁去斯图加特采风。临行前，赫塔准备了很多生活必需品，装了满满一双肩包。

两位作家来到地铁站，当车站的绿灯亮起，提示乘客们开始进站时，赫塔突然取下了一直背在肩上的双肩包，改用右手拎着。看着赫塔一副吃力的样子，格拉斯不解地问：“我的朋友，双肩包背在肩上不是更加轻松吗，为何要取下来呢？”

赫塔缓缓说道：“以前我也有你这样的想法，但现在我不会背着它进站了。”“为什么呢？”格拉斯追问。

赫塔看着手中沉甸甸的双肩包说：“三年前的一个周末，我也是和今天一样，背着双肩包乘地铁外出。上车时，为了省力气，我没有取下双肩包。突然，我听见身后传来哭泣声。回头一看，原来是跟在我后面上车的一



赫塔·穆勒

负重心安

◎郝金红

个小女孩，被我背上坚硬的双肩包划破了额头，鲜血淋漓。当时我吓坏了，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心里惴惴不安。一车的乘客都指责我，说我是一个只

想着自己方便的女人。但是，女孩的母亲却没有责怪我，而且她拒绝收下我赔给她女儿的医药费。三年来，一想起那个额上可能留下伤疤的小女孩，我就无法心安。从那以后，我就认识到，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伤害到别人。你也应该看得出，如果我背着双肩包上车，后面比我矮的乘客，就很有可能会被伤害到。我不想这样，因此宁愿负重，也不能让自己于心不安。”

正是坚持这种“负重心安”的做人原则，赫塔·穆勒写出了《地下的梦》《呼吸钟摆》等大批散发着浓浓爱心的作品。2009年，赫塔·穆勒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有人说，赫塔能获此殊荣，不仅是因为她卓越的文学才华，还有她时刻为他人着想的人格魅力。

（浩 玮摘自《做人处世》2015年第17期）



故宫有多少把钥匙 ◎于 丹

一天，我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老郑坐在小院里喝酒。

啜一口酒，老郑问我：“你知道故宫有多少把钥匙吗？”

我摇摇头。

“五千多把。总共有一千七百多处有锁，一把锁起码有三把钥匙。还有好多明代的钥匙，现在被收起来了。早晨七点和下午五点，是大伙儿集中领钥匙、还钥匙的时候。嗯，就像这会儿。

有光有阴，光而不耀，阴而不沉。每天早上，我们领了钥匙，在晨光熹微中开锁推门，同时喊一声——开门咯！有时还伴着一声咳嗽。为什么呢？大家是给宫里面那些黄鼠狼啊、刺猬啊、蛇啊提个醒，打声招呼——嗨，有人来了。”

“敬重生命。”我说。

“呵呵，万物有灵嘛。据说这是清代宫廷传下的规矩。我突然想起母亲。那一年，母亲去世三天之后，我的孙女出世了。那是怎样一种人生的况味啊。”

“悲欣交集。”

“对呀，悲欣交集，感慨莫

名。如同故宫里那一扇扇院门，门后就是我的人生。无论手上有多少把钥匙，心里有多少个愿望，开门前一刻，谁能预知门里是悲伤的狐狸，还是喜乐的小兔？我们能做的，就是当朝阳升起时，让那清新的水汽、无穷变幻的光影恣意涂抹，充盈我们的心房。当夕阳西下，满院瑟瑟而余温犹存时，我们轻掩柴扉，把一缕斜照珍存。今天关一扇门，明天开一扇门，这大约就是人生吧。”

（于 涵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有梦不觉人生寒》一书）



如果你有一名穷亲戚

●石晓枫

这是一场除了家属之外，仅有十一人前来吊唁的告别式。其中八名，是甫入职场、平日并不熟稔的同事；再有，则是往生者的友人代表，计三名。

躺在棺内的是我的大伯父，在我尚未知世事之际，他便离开故乡金门，奔赴台湾打拼。我与他关系生疏，原因有多重：其一，大伯父其实与我们并无血缘关系，他是祖母当年从厦门买回的养子；其二，这养子自小不学好，整日逃学在外，祖母拿他没辙；其三，长大后他情事荒诞，祸事连连，祖母对他更加死心。根据父亲回忆，少时逃学的大伯父不敢返家，每每溜到学校里，趁下课时向父亲伸手要零用钱。经春至冬，他睡在庙里、别人家廊下，单衣抵不住风寒，也是父亲夜深时背着祖母，隔窗偷送棉被给他。年轻的大伯父决定赴台发展时，盘缠不足，便找到父亲

的工作场所，开口要钱。其时父亲一人的薪水要养一个五口之家。

我不喜欢大伯父，对他甚至有些畏惧，虽然在有限的相处记忆里，他总是阔气得很。小学时我曾被选为代表，由老师领队赴台参加研习营。我们搭了十余小时的船，在风浪翻滚中呕吐着抵达高雄，再连夜赶搭火车来到台北。大伯父得知消息，鲁莽地跑到和平东路，立马将我带走。为了表达欢迎之意，他要我在百货公司挑件新衣。“不要客气，我出钱！”大伯父拍着胸脯，相当豪气地表示。其时，我首次与传闻中的第二任大伯母见面，她带着正值二八年华的女儿，与大伯父再婚。少女服饰专柜充满了蕾丝花边和蝴蝶缎带的柔软视觉感，如村姑一般的我仿佛进入白雪公主的幻境。然而四人同行游览，大伯母却自始至终绷着张

脸，她像童话里的后母，对着青春期的姐姐说：“我们挑我们的，也不用客气。”

后来我才知晓，大伯父自幼逃学，大字不识几个，到台北之后四处谋职，也只能到工地打打零工，生活其实并不宽裕。但为了体现善尽地主之谊的热情，他领着我去逛终年难得逛一回的百货公司，购置必须花费竟月工资的衣裳，此举自然令另一半不快。这是大伯父粗拙爱心的表达，在霸气、阔气中掩藏着不愿被人瞧不起的辛酸。

大伯父的另一半后来因豪赌而债台高筑，两人最终离婚。此后，祖母与大伯父的关系愈加败坏，大伯父也难再回金门。拖到五十开外，经人介绍，大伯父娶了第三任太太。我的新伯母行动不便，约莫正因为如此，才委屈嫁给年岁已大犹居无定所的大伯



父。尽管如此，夫妻俩仍生了个儿子。大伯父老来得子，自然甚感安慰。记得当年与小堂弟初次谋面时，他已是活蹦乱跳的年纪，大伯父不改一贯爱教训人的习气，扯开大嗓门对着我说：“你是姐姐，要好好教导、照顾你这个弟弟。”我心里嘀咕着：我们极少有交集，年纪又差那么多，到底该如何照顾他？然后想起我约莫也是这般年纪时，当时膝下尚无子的大伯父回到金门，带着年幼的我到文具店，我挑了款色彩缤纷的铅笔盒，大伯父大方地从架上取下另一个，说是也给妹妹买个礼物。“妹妹刚刚才买新铅笔盒呀！”我说。没料到大伯父为此狠狠训了我一顿：“只给你买礼物，妹妹就没有？做姐姐的不能这么自私。”当着文具店老板的面被训，我噙着眼泪，心里充满了被误解的委屈。

大伯父对自己的孩子，约莫也将以这般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吧？不给解释机会，毫无通融余地，强制灌输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念。看着天真的小堂弟，我暗暗为这孩子担心。然而，此去经年，直到堂弟念研究所了，生疏的亲人才在婚礼场合重逢。十余年间，我曾听闻大伯父屡次向亲友借贷。他们一家迁徙多地，父母曾经到三重、板桥、芦洲等处探望过他们。每逢开学季，父亲也会从金门邮汇款项，资助小堂弟上学。作为子辈的我们，无论如何不愿与上一代亲族多有接触，因为教训是永远听不完的，麻烦是永远不会终止的。

而大伯父仿佛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事风格。多年后，当我终于循址来到陌生的居所，见到久未谋面的

伯母时，一切恍如昔日。伯母戴着墨镜坐在桌前，手不停歇地折着纸莲花，她对来者哭诉大伯父临终前的种种负气行径，那完全是率直鲁莽的。我在临时设置的灵位前拈香。照片里的大伯父，除了两鬓微霜之外，那皱纹深刻的额头、炯炯的双眼、黧黑的脸庞，与印象中并无两样，脸部粗硬的线条在修饰下，反而添了几分慈祥。然而倏忽间，他已成为被祭拜的对象。只是灵堂里少了念诵佛经的超度，也不闻哭天抢地的号啕。

午后这临街的家是安静的，伯母因眼疾之故，行动不便，显然无法经常走亲访友，大伯父晚年亦罕出门。多年来，这一家子大概过着默默在底层挣钱、谋生活的日子，在城市与城市不为人知的边角，他们缓慢而认命地移动；在债主与债主交替临门的缝隙，他们谦卑而侥幸地找寻生机。我在沉寂暗哑的空气里，勾勒着大伯父晚年的身影，揣想旧时他行走的足迹。我想到我们这些大伯父口中的“读册人”，总是呐喊着要关怀弱势群体，在需要捐款、捐助物资的时刻，慨然共襄义举；我们认领偏乡贫国的孩子，按月接收他们的信件与近况报道照片。然而，如果身边就有一名穷亲戚，如此真实、如此迫近地存在于生活视野里，我们又会如何对待？不，不要找上我，我不想被牵扯。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如看待瘟神般。

大伯父半辈子为生活所迫，辗转于餐厅、妓院等场所打杂，经年担任洗碗工、清洁工，年纪一大把终于娶妻生子，在台北都会区的底层打拼，年老体衰后退休。在这样的劳动生涯里，大伯

父的交际网络终究只能如此贫薄：亲人少数，友朋三名。告别式最终，我们绕棺行走，看到的是大伯父瘦小的遗躯，仿佛象征着他在人世的渺小存在。礼仪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再叮嘱着不要回头，顺时针往前绕行。是啊，如此畏惧被牵缠的我们，怎敢回首？

还记得家中始终保留着小堂弟幼儿园的毕业照，那是大伯父多年前郑重从台湾寄回，作为家族命脉传承的隐形宣告。虽然幼年离家、养母不欢、家族殊少闻问，但大伯父晚岁屡屡返乡扫墓，也在金门四处走逛，寻儿时欢游之友、旧时戏耍堂屋。所谓叶落归根，父亲说，若有任何线索，大伯父亦必将去厦门寻他的坎坷身世。

然而一切无非徒劳，最终大伯父没有生身血脉的消息，没有养父母的疼爱，也没有赢得晚辈的敬重。人说生死哀荣，但在大伯父身上，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轻贱、枉然与命定。想起大伯父故去后，伯母曾表态，希望我们帮忙“作句”。母亲在电话里询问我的意愿，并且略作暗示：“大伯父膝下仅有一子，人丁单薄，若你们不去，场面会很冷清。”“不要啦！我们跟他又不熟，而且这样很假呀！”我记得当时，自己以没有情感基础、虚应故事的仪式不具任何意义为由，断然拒绝。

唉！如果你也有一名穷亲戚，在情感、道德与伪善之间，这门世间功课，究竟该如何落笔？

（曼 凡摘自九州出版社《那些无言的离别忧伤》一书，王青图）



我是怎么读书的

●马未都 ○李雪源 整理

“我读的最枯燥的书，对我的影响最大”

读书有一个好处是锻炼抽象思维能力。我们今天已进入读图时代，我们反复在问自己：读书有什么用？读书是读字啊，你要锻炼你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人类文明之所以推进，是因为人类发明了文字。我们读文字，即便是象形文字，也是在锻炼抽象思维能力。所以读文学书的时候，你的理解跟别人的理解可能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开始大量读图，大量读图是会限制一个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读图的危险逐渐向人类靠拢，但我们浑然不觉。今天纯文字的书已经非常难卖了，包括我自己的书都拼命地往上配一些画，来让你理解它。抽象思维能力是我们人类几千年来积攒的财富。我认为我一生中读的最枯燥的书，对我的影响最大；最有意思的书，对我的影响是适度的。因为有意思的书，你可能很少去想，越枯燥的书你想得就越多。我一直在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多迈出一步呢？凡事多想一步，就容易获得成功。”

读书的三个阶段：诵读、学贯、涉猎

古人把读书分为三个阶段。5岁到15岁是第一个阶段，叫“诵读”——背下来就过关，不需要理解它。第二个阶段是15岁到25岁。这个时期读书非常重要，古人叫“学贯”。要知道文理之间是有关联的，要知道怎么去关联所有的学科中有价值的东西，怎么在未来的生活中应用。这个时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到硕士毕业的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25岁

到35岁，要做到两个字“涉猎”。一定要读不是你专业的书，什么书都要读。

人生的三个阶段：趋利、趋名、趋静

我们都很希望在生活中有所追求，我们希望生活能够达到一个内心的标准。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趋利是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为什么要趋利呢？因为你不想给这个社会增加负担，你不是一个靠乞讨为生的人，不是一个靠救济为生的人，你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而且要生存得更好。所以只要在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趋利就是你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当你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开始趋名。这个趋名也不是要成为名人，而是你要趋你自己的名声，你会看重自己的名声。比如我做这件事，我的同事怎么看我？我的家人怎么看我？我的朋友怎么看我？你会考虑为这个名声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是否值得，这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人生要趋静，就是要趋向内心的安静。我们生活在这个纷杂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焦躁和痛苦。我见过很多有钱人，生活非常痛苦，老想逃离现实。一些有巨额财产的人，因破产而跳楼自杀了，结果人家说他那账面上还有好几百万美元呢。他有那么多钱怎么还去自杀呢？就是因为他不能承受这个落差。我们要有精神享受，这种精神享受，浅的是去看一场电影，听一支

歌，深的是去读一部文学作品，感受文学作品带来的愉悦。这种愉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文博摘自《北京广播电视报》2015年6月18日，（意大利）德尔庞图）





有一天，我去德国一个小学一年级的班级听课。他们正在上地理课。黑板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没有国家的名字，而是印了和那个国家有关的动物、植物，或者建筑物。老师让孩子们找出德国。每个孩子都举起了手，一个女孩子被请到黑板前，她轻松地拿起教鞭，点到最中间有勃兰登堡大门的地方。我也是出了国以后才知道，每个国家的世界地图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把自己国家放在地图最中间的位置。

一定是因为我，接下来老师让孩子们寻找中国。这个问题有难度，举手的孩子只有三个，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老师把这三个孩子一起请到黑板前，让他们先商量一下，再告诉全班同学正确的答案。

这三个孩子显然意见很不一致。一个男孩把手指头直接点到最下边的南极，一个男孩指到地图最左边的日本。那个女孩很有把握，指着有熊猫的地方。三个



德国孩子的地理课

◎程玮

孩子低声商量了几句，统一了意见，转过身来面对大家。老师让那个一开始点到南极的男孩子向全班同学宣布答案。那个男孩接过老师的教鞭，重重地点在大熊猫上面，大声说：“这里！”

老师也大声说：“正确！”并带头鼓起了掌。三个孩子在掌声中无比自豪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下课后我问老师：“为什么第一个问题让一个孩子上讲台，而第二个问题却让三个孩子同时上讲台？”老师说：“第一，因为第二个问题举手的孩子不多，那些敢于举手的孩子，应该受到鼓励。第二，我知道第一个男孩肯定不知道答案，第二个男孩是否知道，我没有把握。但是，那个女孩子是肯定知道答案的，因为她的爸爸去过中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男孩子最喜欢举手，但每次都答错。所以，我要为他提供一个答对的机会。最后，其实问题的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要寻找每一个机会赞扬孩子，提高孩子的自信。”她很得意地说：“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机会。”

（孤山夜雨摘自《扬子晚报》2015年8月3日）

各种烂片奖

名称	国家/地区	创办时间(年)	创办机构/人	是否存活
金酸莓奖(Golden Raspberry Awards)	美国	1980	约翰·威尔逊	健在
火鸡奖(Turkey Movie Awards)	美国	1998	《纽约邮报》	健在
Naftas	英国	2002	Virgin电台 The Drivetime Show 节目	不详
Golden Kela Awards	印度	2009	《兰登杂志》(Random Magazine)	健在
Ghanta Awards	印度	2010	Prashant Rajkhowa Karan Anshuman	健在
金扫帚奖	中国	2009	程青松	健在
金榴莲奖	中国香港	2003	BC Magazine	2009年停办
金话梅奖(Golden Prune)	中国香港	2006	《苹果日报》	健在
金驴奖	中国台湾	2010	今日新闻网	健在

（启航摘自《新周刊》2015年第15期）

“《读者》光明行动”(30)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在中国，虽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代早已过去，但“生不起病”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农村孩子的生活现状仍然令人揪心……小虎是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的一个苗族孩子，今年12岁，双眼患有弱视，左眼还因高度远视引起眼底病变，视力只有0.1。小虎的父母外出打工，所以，小虎不仅要学会独立生活，还要担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他在日记里写道：“到了晚上，妹妹总是会哭，但我不能哭啊！我是

男子汉，要坚强……等妹妹睡着了，我就站在窗子边，望着天上的星星，默默地说：‘星星啊，要是我的眼睛有你们那么亮，该有多好呀！’”

2015年9月，“《读者》光明行动”募款额突破700万元。感谢所有爱心人士的信任与支持！公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来自五湖四海的点滴温暖让我们相信，世界的改变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2015年9月20日，“《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将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展开第20批弱视儿童免费筛查行动。腾讯乐捐通道已开通，用微信“扫一扫”即可捐款，数额不限。还可领取捐款箱，发起爱心筹款，邀请朋友“一起捐”。聚微爱，成大善，让我们一起帮阿坝弱视孩子看清世界！



读书喝茶有私享 中秋国庆送特惠

加入读茶会，生活大不同

读茶会，是由读者杂志社发起创建的互联网主题社交平台，是为《读者》粉丝量身定制的会员俱乐部。

读茶会以读好书、喝好茶为初创理念，倡导“让生活更有品”，为会员提供精品阅读、文化交流、众筹公益、线下读书会、茶会活动等服务内容，并将陆续组建地方分会，为全国各地的《读者》会员提供本地化延伸服务。

读茶会自创办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 ducha798，已推送数百篇优质文章，举办了数十场读书会、茶会、公益活动等线下活动，受到喜爱读书、喝茶的朋友

们的关注。读茶会致力于帮助大家找到志同道合的书友、茶友，形成与众不同的文化交流社区，日益成为中国爱书人和爱茶人的精神家园。

爱读书的人有思想，爱喝茶的人更要有私享

秋意浓，天渐凉，正是喝红茶的好时候；双节至，相聚欢，正是送惊喜的好日子。

时值中秋、国庆双节，读茶会倾情出动，隆重为您推出私家享受超值巨惠——58元红茶专场：以傲视全网的性价比，将原产地、高品质、无农药残留的放心好茶，送到您和您的家人、朋友面前。并特别推出个性化订制服务，不管您是自享还是送人，

每一份订单都可接受您的私人留言，助您完美展现个性自我、表达特别心意、传送节日祝福。（详情请进入 ducha798 公众号“读茶商城”查看）

现在加入读茶会，还可获赠50元代金券

为答谢粉丝厚爱，继续推出读茶会会员专属福利大放送——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ducha798 微信公众号，立即获赠50元读茶会代金券！（代金券使用方法参见 ducha798 公众号内会员公告）

动动你的手指，快来加入吧！

